#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期1 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把握1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1 2019.9.11

上学期主要澄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义：和其他哲学，在形态、功能、哲学志趣上有极大的差异。它不追求对世界形成一种统一、根本的理解，而是在于理解现存的一切东西。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哲学，在于帮助我们以一种批判性的眼光来领会社会现实、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东西。那么，这样一种哲学路径是何以可能的？马克思通过对生活世界和观念世界关系的颠倒来完成，认为世界创造观念，主张从社会现实的深入批判中理解观念的实质，而非相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所谓意识无非就是被意识到的存在。”颠倒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上学期的重心，是讲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张从社会存在出发去看社会意识而非相反，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

所以上学期期末重点讨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对社会的发现。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中，他发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样一个“社会”是一个完全现代的东西，和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生活，中世纪的团契生活等等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资本主义时代的出场。出现一个新的把人们组织起来的方式——市民社会，也就是现代社会。这个社会，是无法用国家和政治的分析来代替的，而要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把握。

马克思对这样一种社会如何批判、分析？他的理论框架发生很大的变化。《1844》中马克思把社会理解成一种人的存在方式，更准确地说，一种理想共同体——人与人的联合。用这样一种人本主义的眼光来看社会，更加追求的是“什么才是合乎人的原则的社会形态”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社会当中人的矮化、物化、异化现象，如何扬弃种种异化，达成一个理想的社会共同体。也就是说，他追求的是一种理想。随后，马克思从“人的社会”开始转向“社会的人”，开始重点分析人在社会当中实实在在的境遇，不再把人作为哲学的原则去评判社会，而是把社会作为既定前提理解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对社会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 马克思不认为社会是个人的一种简单集合，也不认为社会是原子化的个人依靠所谓契约、自由、正义、平等简单结合而成的，而是认为，这样一种原子化的个人，与其说是社会的基石，不如说是社会的产物。他不是从个人的意志出发理解社会，把社会理解成一种经由人的交往关系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独立存在。

2. 按照上一个观点，马克思更加关注的不是原子化的个人，而是个人和个人之间以什么样的方式连接起来，也就是他们的社会联系、社会关系是什么样的。所以他认为，社会的关系连接，既不是基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人性，也不是黑格尔的需要体系，也不是斯密的交换—市场机制。他认为，真正的社会关系的含义，是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对社会的把握必然要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维度。

这是我们上学期讨论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就理解了马克思对于社会的一个把握原则/方法论——实践的观点。把全部社会生活理解成实践的产物。“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发现了社会的独立性、结构性、总体性、历史性等种种特点。

从实践的观点理解社会，只是对于现代社会把握的一个比较抽象的方法论的前提性说明。但是，它仍然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方式。从这学期开始，进入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问题是，当马克思要求人们用实践观点观察社会存在的时候，他如何去把握这样一种社会存在？

今天就讲第一个问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按照我们经典原理的叙述，本来的顺序应该是：

1.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构成整个社会生活的动力系统。社会之所以发生方方面面的变革，由于这种辩证关系。

2.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讨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等等。

3.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整个社会存在。把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这好像是唯物主义经典原理叙述的过程。但我并不准备这样来讲。为什么？

——这里有肤浅的原因也有深刻的原因。

所谓肤浅的原因，我们说，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都是从表层开始，慢慢进入其内在的所谓动力系统来，是由表及里的过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存在的把握也是经过这样一个马哲史的路径，也是从社会意识深入社会存在，然后进一步发现决定性决定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然后慢慢产生对生产关系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考路径、对现代社会把握的深入程度也正好是3-2-1的倒过来的顺序。

所谓深刻的原因，接下来还会不断探讨。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学期开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把握，就是首先考虑如何理解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的有机体，可以分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先要明白：为什么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为什么对现代社会的把握要从经济基础出发？经济基础所指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什么？为什么要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讲课的顺序。

先谈第一个问题：**怎么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原理滚瓜烂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然，还要进一步分条展开：什么叫决定、什么叫反作用。然而，这种理解是最成问题的，因为当我们轻而易举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对于这个原理的理解方式实际上是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成了两个实体性的东西，然后在这两个实体性的东西之间像函数一样建立映射关系。什么叫“决定”呢？就是说经济基础是自变量，而上层建筑是因变量，前者变化了后者也变化。这是我们的理解。这种理解方式被我们称为**知性的理解方式**，也就是一种**外在**的理解。所谓外在的理解，就是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先预设成两种不相关的东西，再强行建立决定和反作用的关系（函数式的映射关系）。我们说，这显然是低于马克思哲学水平的。马克思无论如何也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之上往前推进，而非倒退回康德就已经批判过的经验主义的知性理解的。

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在马克思看来，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二者不仅有交互作用，而且呈现出某种内在的一致性。这种内在的一致性如何体现，今天就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分析什么叫决定，什么叫反作用。（反作用就是决定的对立面）

**什么叫“决定”**，是马哲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理清楚，就会陷入知性的理解。例如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理解成“小孩换衣服”就是知性的理解。

那么，什么叫“决定”？

——对“决定”的理解有两种方式。形象来讲，一种是**英国**人的方式，一种是**德国**人的方式。

英国人对“决定”的理解，在经验主义传统中，就是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比如我们说“A决定了B”，按英国经验主义的理解，“决定”的意义就是“A是B原因，B是A结果，B从A中推演/产生出来”。按这样一种理解，进一步推演，就会认为，经济基础是原因，上层建筑是结果，原因决定了结果。进一步把A和B理解成两种不相关的东西。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理解，一望可知非常肤浅。

德国人所讲的“决定”，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叫决定，而应该叫“规定”。准确翻译的话，是“经济基础**规定**上层建筑”。所谓规定，具有2个层面的含义：

1. **赋予规定性**，也就是“定性”。即，B的性质是由A的性质所决定的。例如，这样一种上层建筑，其阶级属性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当黑格尔说“A规定了B”，这个时候A就具有一种**主动性**，黑格尔把这种主动性的A称为**行规定者**。

2. **决定其界限**。关于“赋予规定性”，黑格尔及其前辈斯宾诺莎共同秉持“规定即否定”的观念。赋予规定，也是在决定其界限。这种界限，有2种划分方式：(1) **概念的**，也就是黑格尔的方式。黑格尔之所以认为观念能统治世界，观念具有能动性，是因为概念决定了“这个不是那个”、划定了“这个”的界限，概念不满足于这种规定性，所以作为一种自由的理性精神要扬弃规定形式、突破界限获得发展，回过头看，既定的概念就是既定的界限留在那里。所以黑格尔这里，规定—自由不断进行辩证运动，基于概念的主动性、理性的精神。(2) **历史的**，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不是说理性不满足于这种规定性，而是强调历史的发展使得它呈现出一定的界限。所以，这样一种界限的生成、划定和突破不是理性概念所决定的，而是历史运动当中不断生成的。这就是马克思和黑格尔两个人之间的差别所在。

但是，不管他们有什么差别，他们对于“决定”的理解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我觉得，在马哲里，决定基本上是两个基本的理解：赋予规定性、决定其界限。这是德国的。它和英国人的理解方式，本质上的区别就在于，英国人认为，A和B建立了这样的因果关系、生产关系，所以B是由A来生成的，没有A就没有B；而德国人的方式并不是强调A生产出了B，不是无中生有，本来没有B，因为有A存在才生产出B，而是“要想理解B，必须要理解A”，也就是说A是B的前提。B的生产和A没有关系，但是怎么去理解B，就必须要去理解A。

举例来说，上层建筑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一直存在，有政治机构、国家，有权力系统，有观念、意识形态。这些都是存在的领域，并不是从经济基础去制造/创造出来的。如果认为上层建筑只能由经济基础生产，那不是马克思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这两个都存在，但要想理解上层建筑，首先要理解经济基础。如果不预先理解经济基础本身的性质，就无法把握上层建筑的性质。如果不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是没法变革上层建筑的。根源在经济基础，只有变革了经济基础才能变革上层建筑。

这样看来，“赋予规定性”即要想理解B就必须预先理解A，A的性质规定了B的性质，也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而不是说“第一性生产出第二性”；“决定其界限”即要想变革B就必须首先来变革A。总之，A不是B的创造者，而是B的前提。

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在英国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英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流派——**文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是**汤普森**和**威廉斯**。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后者特别有意思，罗列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关键词，比如身份、多元主义、阶级、意识形态、商品等等。他把它们放在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理解，是今天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学术范式。这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强调文化，因为他们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在恩格斯逝世之后西马者普遍遇到的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世界的革命逻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往无产阶级陷入赤贫，这个世界分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两个尖锐对立群体，会发生决战/革命。马克思对于革命的必然性论证是建立在这个社会两极分化基础上的。然而，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福利国家的形成，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变成了“工人贵族”。这种情况下，怎么革命？这是恩格斯逝世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

这个问题在西马开山祖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到。现在的工人没有阶级意识怎么办？

列宁的答案是——灌输。（笑）好像是不讲道理的，但列宁有其理论论证。他的论证建立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黑格尔有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叫自在和自为。所谓“自在”，就是“我活着”，但“我活着”不一定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我知道我是谁”。“我是谁”的问题，就是“自为”的问题，需要靠清晰的自我意识来解决。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建立，所以不能说有了无产阶级——这帮人最穷就最革命。列宁说，无产阶级不知道自己是谁，而先锋队（共产党）知道无产阶级自己是谁（根源、社会使命等等），由此灌输给无产阶级，使之从自在上升到自为的高度。

不要以为列宁很肤浅，也不要以为他借助黑格尔自在/自为——自我意识的辩证法，好像就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了。列宁是一个革命家。他的精彩论证是：如果没有阶级意识的灌输，工人只会进入到公园主义，不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有一点好处就可以收买，考斯基这帮人就是这样，达不到社会整体的变革。

那么，灌输靠什么？——靠组织。所以列宁特别强调组织。列宁的这种“革命家的霸道野蛮的逻辑”很容易就遭遇“小清新”的反思和批评，比如卢森堡、卢卡奇对列宁的这点都有所保留。卢森堡就说，列宁的逻辑到最后都要确立起党的领导地位，革命最终就会变成集权的革命。都反对列宁的路子，那么，怎么让工人在吃饱了饭的情况下还愿意社会革命、实现社会总体变革？这个是很难的。怎么办？卢卡奇的论证就是，要让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一种总体性的理解。但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现实当中这样一种阶级意识迟迟无法建立。所以后来西马转向另一条路：在经济、政治上无产阶级都获得了一定的权利，那么就在文化领域来突破，来争夺文化领导权。所以葛兰西、威廉斯、汤普森等人都想“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这有一定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文化精英们没有一个是满意资本主义社会的。就是资产阶级自己的文化精英都无法容忍资产阶级自己的粗鄙疏浅。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审美书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变成一种冷冰冰的利己主义。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文主义传统一直很强大，西马也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唤起工人的阶级意识，在文化的角度搞革命。

所以，汤普森、威廉斯等人开始举办工人夜校。他们说，你恩格斯不是说“德国的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好的继承人”吗？工人阶级的文化也可以比资产阶级的文化来得更高。这点在今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比如，工人阶级的文化以“匠人精神”来打造，以“田间地头的真实情感”打动我们，而文化工业包装的“小鲜肉”只能刺激感官无法触及灵魂。所以工人可以通过文化的提升变成革命的力量。

他们这样做了。于是提出了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到底对不对？

按照普遍的理解，那就不对了。英国的经济基础自然是资本主义的，然后合乎逻辑地，就只应当推出“资产阶级有文化，无产阶级没文化”。但事实上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不是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所以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批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威廉斯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是马克思的一个**隐喻**，只是一个比方，而非真理。

进一步问一个问题：当汤普森、威廉斯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之所以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原理会得出“资产阶级有文化，无产阶级没文化”的结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包括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在内，人们都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解成了外在的决定关系，是一种“英国式”的经验主义传统的理解，而没有搞明白到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什么含义。按照“德国式”的理解，绝对不是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一定会生产出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文化体系。马克思的意思不是如此，而是说，当然存在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文化观念，也存在资产阶级的文化观念，但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所规定的。所以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原理的批评促使我们对惯常理解这个原理的方式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根本性的反思，第一点在于，反思“什么叫决定”。不是两个实体性的东西之间的外在、知性的因果联系，而是内在的根本联系，表现为规定性和界限两点。根本就在于，要想理解上层建筑必须先行领会经济基础，而不是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必然会生产出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理解上层建筑的一种视野。

**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我们要强调第二个观点：不要把经济基础理解成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要理解成一种分析框架和理论视野，是马克思把握社会存在的一条线所。这和第一个观点——如何正确理解“决定”联系在一起**。

《1857序言》：“我通过研究一经得到便马上运用的……”——马克思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不是理解成原理，而是一个索引。

生产力是理解生产关系的视野，经济基础是理解上层建筑的视野。

那么，什么是“视野”？上层建筑要想获得一种通透的理解（透视），就必须先要来看经济基础。这是我们从上面所推出来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意味着，我们从上层建筑出发，是无法来领会和把握上层建筑本身的。

要理解这一点，就要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也是第一次讨论课的文本。阅读第二章（家庭）的最后一部分（专偶制）。

所谓**专偶制**，就是一夫一妻制，这是我们今天现代社会一种主流的婚姻形态/家庭模式/两性结构。（古代中国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这样一种专偶制，是社会生活的表象。社会是家庭构成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表象是婚姻家庭关系。对今天这样一种专偶制的婚姻家庭两性关系（作为上层建筑），有三种理解方式：**情感、伦理、法权**。

1. **情感**的理解方式 **爱欲**

从情感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说，“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也就是把婚姻的基础看成是**爱欲**。男女产生性吸引力，然后结婚。一拍即合一见钟情马上滚床单，然后结婚，这叫爱欲的理解。这实际上就把婚姻的自由结合理解成自由恋爱，把自由恋爱进一步理解成自由性交。这肯定是最肤浅的，因为它把婚姻和交配等同了。显然，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2. **伦理**的理解方式 **义理**

最无法接受1的就是黑格尔，所以他提倡从伦理角度把握婚姻。他强调婚姻的**义理**。婚姻不是靠爱，而是靠双方忠诚的义务维系的。这里面要有理性的支撑，而不是1那样停留在感性的阶段。黑格尔说“恋爱是感性机制的”。结婚是“头脑一时发昏”，在错误时间地点发生错误冲动做出错误选择，然后这样的婚姻怎么维系呢，黑格尔说那么就将错就错。（笑）他说：“婚姻是最直接的伦理关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

黑格尔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并不认为恋爱是婚姻的基础。为什么？——他首先区分了重要的概念，认为爱和欲不是一回事。爱是婚姻的基础没错。但是，黑格尔认为，当你讲欲望的时候，这不叫爱，而是喜欢。“**喜欢**”的意思，是“**占有**”，是一夜情的基本模式。而爱意味着**克制**。“我喜欢你”我们受过哲学训练的人听来真实含义就是“我想占有你”。（大笑）

爱是克制，意味着，爱是可以作出牺牲的，牺牲是爱的证明。

那么，黑格尔为什么可以在爱和欲之间区分呢？他说，爱有2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黑格尔一辈子都在干一件事情，上学期一直在讲：德国人在经济/政治上不如英国人，但黑格尔总认为德国人在哲学上比你们英国人优越，可以超越那种蝇营狗苟的市民阶级。所以，黑格尔特别强调共同体。然而，我们现在所读到的黑格尔关于伦理共同体的观念（《法哲学原理》），这是黑格尔在晚年所写的，是在他认真了解市民社会之后一步步了解“行进在大地中的神”，理解国家。黑格尔在年轻的时候也讲共同体，讲的是“爱的共同体”，用爱作为共同体的纽带，解决割裂的市民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思想水平，young and simple, sometimes naïve。（笑）

晚年的黑格尔，则认为，爱是构建婚姻、小家庭共同体的基础。爱有2个环节非常重要：(1) 没有一个人愿意甘于孤独。这点非常像柏拉图对爱欲的定义——基于自身的不完整性，想办法通过找到另一半让自身变得完整。黑格尔也是如此。他说，爱的首要环节是，你并不想做一个绝对孤独的个体。或者说“孤独的人是可耻的”。(2) 你愿意放弃自己的这样一种独立性来和他人结合。这涉及爱当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承认。我在对方当中认出了自己的本质。没有这一条，两个人也不会结合。

基于这样一种承认的爱的关系，黑格尔说，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婚姻家庭两性关系，真实原因是我们愿意为了另一半而放弃自己。最重要的放弃和牺牲是什么？就是不能“任性”。家庭，在黑格尔看来，是要讲责任、义务的，靠伦理。就是靠理性。不能为所欲为，而要尊重对方的想法。这也是我们今天对于理想爱情的一个基本原则看法。

但这对黑格尔来说还不算完全的放弃——最重要的放弃是放弃性交的自由、放弃选择的无限可能性。黑格尔强大的逻辑就这样推演出专偶制的合理性来。克制和其他男女交配的可能性，专心于一个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放弃。这是黑格尔对婚姻家庭的理解。

所以黑格尔说，一个婚约的缔结有两个出发点：

(1) **主观**的出发点：（在黑格尔这里，主观是任性/随意的含义）所谓主观，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一见钟情一拍即合。这是婚姻的主观出发点和主管基础。

(2) **客观**的出发点：理性。为了对方而放弃自己。只有放弃自己，你才拥有了对方——你的另一半、完整性、更好的你。放弃自我是为了更好寻找和重建一个自我，这就是婚姻的客观出发点。

黑格尔强调这种用伦理角度理解专偶制的婚恋观。用中国人的经典来说，就是“发乎情、止乎礼”。要有感情冲动、主观基础，但必须上升到客观的理性。没有从主观基础上升到客观理性的，就停留在恋爱的阶段。只有迈过了从主观到客观的理性一关，才可以迈入婚姻。

黑格尔的这种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也可以和现代社会相参照。为什么有人说“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是耍流氓”？为什么很多男女“恐婚”？两个人进入家庭，要承担无穷无尽的义务、责任，没有那种感情/激情/怦然心动之后，两个人怎么靠义务和责任走下去？黑格尔说，爱情没有了，还可以有亲情。所以这是从主观到客观、恋爱到婚姻要迈出的重要一步。

黑格尔的这种分析非常有道理，可以作为指导婚恋的“鸡汤”。

3. **法权**的理解方式 **平等（权利）**

所谓法权的观点，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的结合，不是男欢女爱，而是彼此承担法律的义务和责任。你们在法权上至少一男一女是平等的，权利义务也是对等的，你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你，你放弃了森林，他也放弃了很多追求者。”

所以，法权的观点讲的是平等（权利）。恩格斯在《家庭、所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说：“我们的法学家认为立法的进步使妇女……婚姻有效，必须是自愿缔结契约、权利义务平等。如果这两种要求彻底实现，那么妇女就能拥有他们所能拥有的一切了。”

以上这三种理解，都是从上层建筑出发，没有触及经济基础。所以，要么是情，要么是理，要么是法，就这三条路。恩格斯对此就有极大不满：他发现，这样三种理解方式，1被黑格尔反驳了，而2、3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现代社会婚姻生活/两性关系的一些突出问题和现象：

Reverse-2. 对于从伦理的角度来分析，黑格尔讲的可以说都非常对，而且经过了严格的哲学论证和探讨。但恩格斯嗤之以鼻：理想丰满而现实骨感。黑格尔所谓对专偶制家庭的伦理角度的解释，都是一种理想状态，代替不了现实。恩格斯说：“专偶制是以普遍的卖淫和通奸为补充的。”为什么专偶制会出现普遍的卖淫和通奸？恩格斯说，“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专偶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但是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我们讲，你去嫖娼不对，对妻子不忠，但恩格斯讲，这恰恰是对专偶制的补充。那么请你黑格尔来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出现大量的婚外情、通奸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专偶制一定会以女方的卖淫和男方的通奸，彼此戴绿帽的方式加以补充？这是黑格尔的伦理视角没法补充的，他理解不了现实。

恩格斯这一点打得很准。黑格尔的整个哲学源于对康德哲学“绝对律令”的根本不满，认为康德不谈现实只谈应当。但这一个问题现在被恩格斯摆到了黑格尔自己面前。

所以，什么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专偶制来讲，就是用上层建筑理解上层建筑都会遭遇无法解释的困境，而要想理解上层建筑，必须要从经济基础当中寻找原因。从经济基础出发，是解决伦理、法权等解释路径中无法解释的难题的突破口。

为什么专偶制要以卖淫通奸为补充？从经济角度，恩格斯加以补充。他的根本观点在于，婚姻关系是由财产关系所决定的。我们的财产关系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在于从母权社会转向父权社会。恩格斯并不认为这是进步：“这是妇女们世界历史性的失败。”恩格斯坦承，这个转变的原因他没找到证据。但是它的确发生了。

财产关系在这个转变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家庭财产不在母系中分配，而是在父系中分配。因此，父子对财产有决定权，女性在家庭经济中沦为附庸。这在恩格斯看来是男女两性在家庭中不平等的最重要根源。女性对家庭的财产没有支配权，以致于只能在经济上对于家庭、丈夫形成一种依赖关系。

有人讲，不对嘛？我们现在都不是老婆管钱？恩格斯的意思是说，你老婆管钱也是帮你来管。说白了女人表面上在管钱实际上是打工的嘛。（笑）这就是恩格斯所讲的，以家庭财产的转移方式区分出了男女两性在家庭经济当中的不平等地位。这种不平等地位出现了两个结果：

(1) 在一夫一妻中，由于男女地位不平等，男人可以寻花问柳，而女人要么厉害一点河东狮吼稍微好一点，要么像尤二姐那样就只能无可奈何了。完全取决于这个女的是王熙凤还是尤二姐。所以恩格斯讲了，在这种情况下，男人的公开或秘密的多妻制一点都不新鲜。恩格斯还在这本书中教导我们：一定要警惕长期的未婚夫状态，那就是为了秘密或公开的多妻制打掩护。所以必然出现冶游。

(2) 女性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必须要维系家庭的形式，但毕竟春心寂寞，所以必然会出现大量通奸。

恩格斯甚至刻薄恶毒到了什么程度？——他对天主教和新教的两种婚姻关系分别作了阐述。他说，在天主教国家（“井然有序”地）“父母照旧为年轻的资产阶级儿子选择适当的妻子，结果固然是专偶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丈夫方面大肆吟游，妻子方面大肆通奸。天主教会禁止离婚恐怕也只是因为它确信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无药可救。”

“相反，在新教国家中，允许资产阶级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一定程度的爱可能成为婚姻的基础……这个点符合新教伪善的精神。……不过，人们在结婚前后，任何情况下，仍然是同样的人。而新教国家的资产者大多是庸人，所以这种新教的专偶制最好最好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婚姻共同体而已。”即“形婚”、“围城”。

“小说就是这种婚姻关系最好的镜子。法国小说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德国是新教婚姻的镜子。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非常枯燥贫乏），法国小说中，则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两者中哪个更坏不是谁都可以弄清楚的，所以德国小说的枯燥和法国小说的绿帽子……随着柏林……德国小说也……通奸了。”

不管天主教还是新教，新教摆脱父母之命，或多或少以爱为基础，但仍然以权和利为前提的。恩格斯更多看到了权、利的关系。利益和感情的矛盾，就是专偶制固有的矛盾。在一夫一妻的忠诚之外必然发展出大量卖淫通奸。这是恩格斯对黑格尔无法解释的困境的解释和完善。

Reverse-3. 对法权解释中的“自由平等”，恩格斯说，现代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根本不是靠自由恋爱完成的。这种自由，只是表面上的形式。根本上还是经济利益的考虑。在我们今天屡见不鲜。上海人民公园成为著名“相亲公园”，双方父母把孩子的基本信息公开，寻“门当户对”的婚姻，无异于把子女当商品在婚姻市场上出售。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上海的大妈大爷对此理直气壮，没有丝毫觉得尴尬违和。这种资本主义利益关系渗入骨髓，如何猖狂可见一斑。

门当户对也有其道理。道理在于，双方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物质条件彼此匹配，意味着双方生活环境大致相同，双方三观相合的机会也就大幅提升。毕竟人是生活的产物。但是，门当户对的这种合理性恰恰揭示出更大的不合理性——三观的相合居然要靠物质基础的匹配？这仍然揭示现代婚姻以物质利益为基础。

关于平等，恩格斯更条分缕析地说，婚前就不平等，婚后就更是如此。婚姻对女性是巨大的灾难：双重压迫。首先，在职场上是雇佣劳动力被人剥削；其次，在家里是免费劳动力无常劳动。对此，恩格斯写得入木三分、触目惊心。恩格斯说，“男女婚后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不见得更好些。……法律上的不平等不是妇女经济受到压迫的原因，而是结果。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子女的古代共产制经济中……”注意，恩格斯认为，古代男主外女主内两种劳动还都是平等的，都是社会的。家庭的之所以也是社会的，因为妇女在家庭中生产家庭的生活资料。“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专偶制家庭的产生……料理家务变成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大工业才给无产阶级妇女提供参与社会生产的途径……”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妇女，也无法兼顾公共事务和家庭的两种责任。表面上是老婆，实际上是女仆。“丈夫是资产阶级，妻子是无产阶级。”现代妇女受到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迫。

恩格斯这段话我们现在女性读了心有戚戚焉。现代女权运动推崇恩格斯不是没有原因。恩格斯指出，法权上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是因为经济的不平等地位造成的。总而言之“都是财产惹的祸”。

恩格斯还给出了非常重要的论证：无产阶级的家庭，没有什么钱，除了有点粗鲁暴力之外不存在上述问题。因为都没什么钱，所以没有经济上的依附关系，所以无产阶级男女的结合反而是以自由恋爱——真正的现代情爱为基础的。他没有那么多经济利益上的牵绊，不用考虑净身出户的后果，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财产，净身出户和净身在家都一样。（笑）无产阶级的现代家庭反而拜托了财产上的依赖关系，形成一种更加合理的家庭形态。

所以可以发现，恩格斯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时候，有几个初步的印象：

首先，恩格斯并不是强调人的所有行为动机都是物质利益决定的。他并不否认情感、爱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恩格斯所有对家庭一夫一妻制/两性关系的理解，反而要求现代家庭都像无产阶级家庭一样，应该建立在情爱的基础上。他对何为理想婚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描述：“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和……消除之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这就是恩格斯对理想婚姻关系的一种展望——去除一切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纯粹以相互爱慕为基础。

“这一代男子在一生中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手段买得妇女献身，而妇女除了爱以外也绝对不会……这样的人们一旦出现……他们自己将作出自己的实践……”这是恩格斯对理想婚姻的展望——不会有男人出去寻欢作乐，也不会有女人要委身与人。

所以恩格斯不是否认情感的重要性，也不是经济决定论地强调物质利益。他仅仅是关注，为什么以爱为基础的婚姻在现实当中却输给了金钱利益关系——这是由财产关系——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导致和决定的。所以根本上，想要获得婚姻的解放，恩格斯说，首先要进行财产关系的变革。这样，才能让妇女重返公共生活、社会生活，才能让今天的男女都以相互的爱慕为基础结婚。

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是说一定要以经济利益动机作为人们所有行为的选择。恩格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现代婚姻当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情非得已”“得不到永远在躁动、得到的有恃无恐”。恩格斯不是去否认人类的美好情感，而是强调这种美好情感、婚姻的合理基础为什么在现实当中不合理地被利益代替。

恩格斯从经济基础审视专偶制这样的上层建筑，强调了，只有从经济基础出发，才能解释像以伦理这样无法解释的社会制度的真相。所以恩格斯对婚姻制度的分析淋漓尽致揭示了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以财产关系分析今天的两性关系，甚至提出了一个深刻问题：这种专偶制在人类古代就已经出现，为什么在资本主义时代才那么发达？

恩格斯说，因为专偶制家庭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匹配的唯一合适的家庭关系。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决定了专偶制在现代家庭生活方式中的地位越来越巩固。为什么如此？讨论课再讨论，读文本去解释。

所以这些，就是恩格斯对于现代这种家庭关系、财产关系的理解。我们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含义其实是“要想理解上层建筑，首先得从经济基础”。不否认伦理、情感、法权的意义，但不能仅止步于这种分析框架。它们无法解释的事情，必须深入到经济基础中去进一步解读和说明。

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刚才讲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赋予规定性——婚姻关系要在财产关系中才能说明，财产关系是基础。另一个是决定其限度——要想改变婚姻关系，就首先要变革财产关系。对于后者，恩格斯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知道了财产关系是专偶制的经济基础，那么消灭了这种经济基础是否专偶制会消失？

——恩格斯说，没有。反而促成了专偶制的更好实现。

为什么？这也是讨论课去思考的问题。

通过恩格斯对婚姻两性关系的分析，我们初步理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好，现在就继续讲财产关系。财产某种意义上也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法权上的财产权。对于这种财产权怎么理解？也出现两种视野，一者是作为上层建筑理解为法权关系，一者是理解为经济关系。这两者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说，区别很大。

现代社会的主流，认为财产权是一个法权概念、财产关系是一个法权关系。所谓法权关系，就是由个人的**意志**所决定的关系。财产权是说，这个东西是“我的”，而“我”——自我意识的建立——是个体意志的表达。所以现代法学家，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法哲学，都倾向于把财产理解成一种个人意志的外化形式。黑格尔说，“我作为自由意志在占有中成为我自己的对象……这方面则构成占有的……合法因素，即所有权的规定。”财产是一种物，这种物之所以叫财产，是因为它是我的意志的对象化（外在）方式。其原因很简单：这个物本来外在于你，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当这个物成为你的财产，就意味着物和人（我）之间发生了关系。这个关系基于占有发生，而占有是基于“我”要占有物的意志。因此，财产权的本质，是在于“我”之意志的外化。这是黑格尔的一个论证。

黑格尔的这种论证，把这样一种财产理解为个人意志的一种外化形式，也就是说这种财产是“我”意志的一种产物，这是今天法学家普遍流行的观点。马克思对此做过一个总结：“在法学家们以及任何法典看来，各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缔结契约，都是偶然的，它们可以建立或不建立，缔结与否完全依靠个人意愿。”这就是对财产的法权的理解，是从上层建筑来理解上层建筑。从法权的角度，契约基于契约双方的意志。买卖、财产权的让渡，体现的是双方的意志，而法律就是为了保障这种意志的自由实现。这是黑格尔及今天所有法学家的理解。马克思对此的态度是什么？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仅仅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就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权力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从私有者的意志出发，这个物根本不是物。也就是说，从法权的角度不叫物。物只有在双方的交往关系中才能够发生。

对此，马克思举了两个例子：(1) 你拥有一块土地，如果这块土地没法产生任何地租，就无法让渡/买卖，就没有价值，称不上是私有财产。(2) 一个无产阶级拥有一件非常破败的礼服，这个破败的礼服无任何交换价值，无人愿意购买，这个大衣对这个无产阶级的流浪汉来说就不能叫财产。

马克思讲这个问题的概念就是说，只有物在经济交换关系中具有一定价值的时候才有真正的产权。光从意志的角度，不构成私有财产。不能让渡就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没有意义。只能是一般的物而不能是私有财产。

所以私有财产不是法权规定的，而是在一般的交换中发生的。所以对财产权，也必须要从经济基础，而不是仅仅从法权的角度去理解。马恩所强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说经济基础有唯一确定性作用，而是说，只有走入经济基础，才能把握社会生活，看到“上层建筑”视角所遮蔽的东西。这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原理”的本来含义。

问题来了：马克思从经济基础出发把握现代社会，那么亚当斯密、李加图这些古典经济学家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两者之间有何实质区别？

——这个区别就关系到，如何理解经济关系的实质？它不是财产关系，也不是商品的交换关系，而是生产关系。斯密、李加图把它们理解成交换关系种种，但马克思将其定位在生产关系。为什么是生产关系？什么是生产关系？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反作用”的问题。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强调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他发现，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没有出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局面，而是行政权主导市民社会。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失效？

**［课程安排］**

**第一次讨论课：《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家庭·专偶制**

恩格斯在这一节中如何来演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第二次讨论课：《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到底如何理解政治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它是否违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讨论课只记考勤，不记表现。期末考试包括概念·名词解释和论述题，不再设立简答题和材料分析题，论述的题目类似于讨论课的题目，如：“请以《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相关段落阐释你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

#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期2 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把握1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2 2019.9.11

**复习：**马克思对于社会存在的把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从最表面的层次来讲，就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那么对于这个社会存在的把握，进入到了第二个层次，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第三个层次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其中一开始浮现在社会存在表面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上层建筑，比如说人们的思想观念，比如说政治势态、政治机构方方面面的这些。作为起到一种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它在这个社会的表层当中是看不到的，它是要进入到社会存在的一步一步的分析当中才能够得到呈现。

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专门强调了一点，就是如何来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节课我们给大家强调，所谓的决定，不是像英国人经验主义所理解的那种因果关系之间的一种对立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采取一种叫做决定、反映的模式来理解。因为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对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对于决定这个概念不理解，把决定理解成了一种因果关系，然后建立起了这样的一种对应关系。

建立起这样的一种因果关系以后，然后下一步就形成了一种化约论，或者说是一种还原论，也就是说把一切的上层建筑全部都还原为经济基础，把整个的社会生活全部化约为某种经济因素。这种化约论再发展下去，就出现了一种经常被人批评的思维方式，叫做经济决定论。在社会存在当中、在社会发展当中、在社会生活当中唯一起到决定性支配性的作用就是经济因素，一切都从经济因素出发来去理解。那么这样的一种理解方式一望可知，这就是一种肤浅的、知性的、错误的理解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根本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本人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的精神是什么呢？马克思特别强调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说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抽象原理，马克思是要用它来达到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合理的把握，也就是说对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进行把握。那么这种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正好把这个给倒过来，他把纷繁复杂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具体给变成了一种单一的、片面的经济因素。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教条主义的一个根源，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了一种公式，凌驾于任何的社会生活之上。同时它也取消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这种互动关系，把这种互动关系变成了一种经济基础来决定上层建筑的单向关系。在这种单向关系当中，尤其是随着因果关系的强化、随着化约论的强化，上层建筑就成了一个质料，它没有自身的规定性。上层建筑就成了一个被动的反应物，它只有被动的接受性，它没有它的能动性，它也没有它的一种独立性。

这个就是以往我们对于“决定”的理解的片面的含义，我们上节课讲什么叫决定，所谓决定就是说经济基础是理解上层建筑的一种前提。什么意思？我们不能单从上层建筑来理解上层建筑本身，而必须要以经济基础的分析作为一种先行的分析，来深刻地把握上层建筑的根源。我们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什么意思？所谓的决定就是理解的前提性。你要想理解上层建筑，你就要先理解上层建筑的前提叫做经济基础。所以在上节课当中，我们通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财产关系对于婚姻关系的这种深刻影响，我们发现对于婚姻的理解不能够从伦理意义上来理解，也不能够从法权的意义上来理解，而必须要在财产关系的视野当中予以深刻的把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强调财产关系、经济基础，这是一种视角，它并不排斥其他的视角，并不是说黑格尔那种伦理的视角、法学的视角全无意义，它不构成替代关系，它构成的是什么？是递进关系。也就是说黑格尔的伦理视角以及现代法学意义上的这种法权视角，它只能让我们认识到婚姻关系中的一部分，这样的婚姻关系当中，有一些事实是这样的视角所无法涵盖的，因此它需要财产关系，需要经济基础这样的视角的出场。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我们这节课就来思考另外一个叫做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所具有反作用。刚才我们讲了，我们错误地理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取消了上层建筑本身应有的一定的地位，把它全然地变成了经济因素的一种附庸。那么上层建筑有没有它自身的规律，有没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是不是完全是被动的？那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给大家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就涉及到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一个反作用。为了阐释这一点，我们这节课也是像上节课一样，挑选了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本，叫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应该说是马哲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作品，这个著作的影响非常的大。20世纪法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类学大师，叫列维斯特劳斯。列维斯特劳斯就曾经说过，他说他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以后，突然发现了一个新奇的新世界，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后来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每次思考一个社会学的新议题之前都要翻几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先读几页做一下准备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总是能给他一种启发，一种什么样的启发呢？总是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去理解出一种结构性的东西，这个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具有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为什么说这本著作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总是有一种误解，我们认为什么作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我们会认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什么？因为在这些著作里面，马克思有一个现成的哲学论述放在那个地方，它代表了马克思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哲学的理解，正面阐述了马克思的这种世界观、哲学观。但是这样的一种哲学观对于马克思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根本的精神是什么？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根本的精神就是实践的观点。这个在《提纲》的最后一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是强调实践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他所强调的这种实践，它所要求产生的是一种实践家的哲学，而不是哲学家的实践。大家明白不明白这样的一个区别？所谓哲学家的实践是说我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已经有了一套哲学的理念、哲学的理论，然后我把这套哲学的理念哲学的理论付诸于实践，这叫哲学家的实践。哲学家的实践在哲学家的个人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哲学史当中遇到了种种的惨败。柏拉图的第二次航行就是如此。

马克思他不是，马克思是实践家的哲学，马克思哲学不是脱离在这些具体的社会实践之外的，而是和这些社会实践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真正代表马克思水平的就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也就是在1848年革命发生之际到1851年这段时间，然后马克思在1852年就写出了这样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就好比我们今天去写一个关于中美贸易战的分析。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真正的魅力，真正的味道就在于它是在历史中去解释历史，在情境中去理解情境，而不是脱离这个历史、脱离这个情境、脱离这个实践，去构建出一套哲学，在用这套哲学来反过来看这个世界。马克思是在这个世界中、在这个实践中，用这种哲学的眼光来去看待它。

所以说体现马克思哲学水平的真正的著作是什么？就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资本论》。你说《资本论》里面有哲学吗？我们讲没有哲学，因为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讲的是资本这件事情，但是马克思怎么发现资本的？马克思对于资本做出了什么样的规定性？马克思是怎么来把握这个资本的？为什么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现代生活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因素？这么一个简单的资本是怎么来创造出我们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的？这样的东西都是马克思身处在资本的时代，而对资本做出一种本质性的理解，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代中在这个情境中、在这个实践中去理解这个时代的本身，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厉害之处。就像我们讲毛泽东哲学，毛泽东哲学就其理论形态而言，那当然是实践论矛盾论，但是我们讲毛泽东哲学真正的体现，体现这种活的灵魂的是什么？是他的《论持久战》，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他在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当中，分析战争策略的具体问题当中，来展现出他这种活生生的哲学、活生生的世界观、活生生的辩证法。所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这也是马哲和其他哲学相比它最为独特的地方。为什么我们哲学系除了中哲除了西哲以外，我们还要有马哲，马哲在我们哲学系，在整个哲学教育当中，它的不可替代性在于什么地方？不可替代性就是告诉我们在现场中去理解现场，他不是跟现场保持着一种隔阂的关系，保持着一种对象化的、一种距离的关系，来把握现实，它就在这个现实当中去把握这个现实。这一点是最难的事情，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做一下。现在中美贸易战发生了，谁能够写出一篇文章，对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来龙去脉，中国的策略做出一个科学合理的判断；我们今天十九大大报告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谁能够在这个新时代的展开过程当中，告诉我们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这个很难的，对吧？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马哲恰恰就要求我们身在此山中来认识庐山真面目。所以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个著作的经典之处就在于此。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谈一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在这个著作里面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首先我们发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著作我们简称《雾月十八日》，这本著作是马克思对于法国革命的一个分析。在上学期我给大家讲过，构成马克思对于德国、对于黑格尔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是在于马克思对于德国问题的关注，马克思认为德国的落后是双重的落后。由于德国的这样的一种特殊性，使得马克思对于德国的哲学产生了根本性的批判。那么同样的道理，马克思对于法国的关注，也是基于法国的一种特殊性。法国的这种特殊性在于什么地方？法国的这种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政治革命的一种典型。马克思曾经多次比较过英国、法国、德国这三个国家的差别，这三个国家正好构成了三个典型。马克思说，如果说英国的无产阶级是工人中的国民经济学家（因为英国的经济），那么德国的无产阶级就是工人中的理论家，那么法国的无产阶级就是工人中的政治家，因为法国对于政治是特别的关心，特别的突出的。

所以马克思终其一生，他都在关心法国的革命，都在关心法国的政治的一种状况。这个是由法国本身在政治革命上的典型性所决定的。这种典型性在《雾月十八日》的序言当中，就是恩格斯在1885年对这个《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当中，恩格斯说：“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幻不已的政治形势，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在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法国这个国家它在政治上特别具有这种典型性。中世纪的时候，它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主义国家，文艺复兴了以后，它又是一个典型的绝对主义王权的国家。法国大革命以后它又成为了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家，它为什么具有这种典型性？因为它具有一种彻底性。

这个跟英国跟德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德国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没有彻底的完成，还停留在封建生产方式当中，所以德国会体现出封建生产方式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并轨存在的特点。哪怕到马克思后来看到了俾斯麦统一德意志，俾斯麦统一德意志，它既依靠德国资产阶级，它同时也依靠容克地主阶级，容克地主阶级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的。而德国的这种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非常的软弱。所以在马克思死了以后，韦伯才会提出来一个叫做政治成熟的问题。德国的资产阶级太不成熟了，它无法承担起它的使命。但是韦伯很无奈，因为容克地主阶级跟无产阶级都无法替代德国的资本主义、德国的资产阶级，他们比德国的资产阶级还要混蛋，所以只能寄希望于这个德国的资产阶级，而这个德国的资产阶级又非常的软弱。这种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使得德国没有建立起像法国那样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资产阶级的共和体系、共和制度。

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这种软弱，再后来就引发了两个思想家的批判，一个思想家就是尼采。尼采对于德国资产阶级的文化、心智这种品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称他们为市侩，要在市侩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卡尔·施密特作为德国的公法学家，对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幼稚进行了批判，以为有了法制有了法权就能够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是魏玛共和国建立起了魏玛宪法，魏玛宪法由此解体，魏玛共和国由此宣告了瓦解，所以这是德国的问题。

那么英国也是如此，因为英国人太狡猾，英国人太聪明了，英国人太擅长于妥协了，所以英国也是各个阶级之间的互相的妥协，来完成资产阶级实质上的统治。英国虽然在实质上是由资产阶级来进行统治，但是它在政治形式上仍然保留了君主立宪的传统，保留了不成文的宪法，它都没有宪法，它是不成文宪法。所以英国的这样的一种政治妥协也没有建立起一种非常典型、非常彻底、非常纯粹的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

唯有法国是如此，所以马克思特别关注法国，仅仅是围绕我们从这个表里面所罗列出来的1789年到1870年这个100年不到的时间里面，法国社会法国革命的种种的一些变化。马克思早年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时候，做的那些对于法国革命的一些阅读，那些摘录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就谈马克思成文的这些著作。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基本上为这么一个短短的一个法国革命，写了大量的著作，至少有三本著作。第一本《1848-1852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二本著作就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第三本著作就是《法兰西内战》。马克思对于这样的法国革命倾注了极大的关注，极大的热情。为什么呢？为什么马克思关注法国的革命？为什么关注法国的的一个政治？因为他发现法国有它的一种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在于它由于建立起了一个相当纯粹的这样一种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双元革命以后，在法国那个地方突然出现了一种政治因素的独立性，也就是凸现了上层建筑的一种独特的作用。如果说马克思的文本当中，我们要找一本能够充分地来展示上层建筑的复杂性、上层建筑的重要性，那么这个文本就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恩格斯曾经有这么一句话，恩格斯说：《雾月十八日》那里所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雾月十八日》这本书讲什么了？就是在讲政治斗争，就是在讲国家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就是在讲这些上层建筑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当然恩格斯还讲了，恩格斯说当然是在他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来讲上层建筑的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今天就来看一看《雾月十八日》这本著作到底怎么来讲法国的这样的一种上层建筑，它对于经济基础到底是具有一种什么样意义的反作用。

那么这本书在阅读起来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呢？首先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就在于马克思本人的修饰方法，因为马克思的修辞太好了，马克思这种修辞可以说是极高明的，也可以说是极糟糕的。这个极糟糕是什么呢？其实马克思要讲的事特别简单，但是由于马克思的这个修辞，把这种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了，所以说我们要向解读密码一样去解读马克思到底在这个修辞背后说些什么事，其实你会发现他讲的事情特别简单，但是它的这种修辞方法使他特别有味道，它这里面提出了隐藏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困难，最重要的一个困难是第二个困难，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法国这样的革命史的不理解。是吧？这个简直就是一个权力的游戏，互相打来打去。然后我们看这个《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们甚至都记不住里面，我们只记住了里面有一个叫波拿巴的，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奥尔良党人，什么秩序党人什么三月党人，什么共和派民主派，各种各样的人物，什么梯也尔什么卡芬雅克等等这些东西，人物出场太多了，你都记不住，你甚至要可能要去画一个人物关系图。那这个是对于我们构成阅读《雾月十八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所以我推荐大家要想来读《雾月十八日》，有两本辅助性的读物大家可以看一看。一个是中央党校出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导读》，因为这个导读里面大量的篇幅在讲文本的这个历史背景，大家可以按图索骥，马克思在这个地方谈到的这些东西，到底对应的是法国革命史当中的哪些事件？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大家可以读一读这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雾月十八日》突出的一个特点究竟是什么？就是在《雾月十八日》当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使得我们不得不关注这个文本，这个思想就是马克思突然意识到，在法国当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国家的相对独立性这样的概念。

在《雾月十八日》当中，马克思用一句话说了这件事情，马克思说：“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机器已经大大的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到波拿巴第二个统治时期，国家似乎完成了它的一种独立的形式，也就是说国家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独立性。什么叫国家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就是在法国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更加看到的是政治所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更加看到的是国家的力量，而不是经济的力量，而不是市场的力量。这是法国的一个特殊性，法国的这种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马克思是这么说的：“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在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大军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国家是非常庞大的国家，力量是非常庞大的。中央集权的传统是非常的顽固的。

那么这个就跟马克思以往的一个观点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冲突，或者说是一个矛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以及之前，马克思都强调一个观点，叫做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对吧？国家的独立性是一种虚幻的，国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国家的实质是什么？国家其实是阶级利益的一种捕获物，是阶级利益的一种代言人，国家处于一种附庸的地位，它是完全被市民社社会所决定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就是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在法国，马克思看到的不是这个，马克思看到的是国家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之外的一种相对的独立性，看到了庞大的国家机器，看到军队的力量，看到了官僚制，看到了中央集权，看到了50万人的官员、官吏这样的队伍。

而且更加可怕的是，马克思突然还发现，国家不仅相对于市民社会而独立，根本没有沦为市民社会的附庸，而且国家还成为了社会发展的主导，尤其是国家还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所以马克思接下来讲到：“这个也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起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马克思在这个地方还说，国家是一种寄生机体，它是一种寄生虫，但是它却缠住了法国社会全身。他是在君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这样的一种国家机器，他是在封建制度当中所产生的，但它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为什么？

大家要知道，这个封建社会跟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封建社会是不一样的。法国的封建社会指的是什么？对应于中国是指的是什么时代？先秦，春秋战国的时代，诸侯林立的时代，封土建邦的时代，这个叫封建。那么封建制瓦解了以后，我们讲法国的历史上，欧洲的历史上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叫绝对主义君权时期，出现了国王的统治。“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了确切规定了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运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的任务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利，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

第一次法国革命就是从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开始，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出场，然后8月26日发布了《人权宣言》，随后92年的9月22日建立起来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以后，到了1794年的7月份，通过热月政变推翻了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的专制，然后到了1799年1月9日，通过拿破仑的雾月政变，当时为了发动革命，让各个地方都发动起来，当时的法国权力出现了短暂的地方的联省自制。在拿破仑上台以后，尤其是1804年建立起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以后，我们发现各个地方的权力都收归中央所有，又回到了中央集权。所以拿破仑为什么是皇帝？他当皇帝所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要恢复这样的中央集权。所以这就是第一次法国革命的任务。他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种族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随后我们发现，在拿破仑建立起法兰西第一帝国以后，出现了波旁王朝的复辟，出现了奥尔良王朝的反复的复辟，也就是七月王朝的复辟。马克思说：“正统王朝就是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这种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易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直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产和国立大学，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他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取高压手段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中央集权，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什么意思？马克思发现从1789年到1870年这一些所有一系列的法国革命都在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不断的巩固扩大，膨胀国家机器，国家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它像一条巨大的蟒蛇一样把整个市民社会严密的包围了起来。

法国的这种国家权力的膨胀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到了马克思后来的《法兰西内战》当中，不得不提出一个观点，叫做拯救市民社会。我们大家知道马克思一直是批判市民社会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到了法国，马克思却提出来了要拯救市民社会，而不是批判市民社会，因为市民社会完全地被国家给压制住了。所以国家力量的这种壮大，这种膨胀是法国的一个突出特点。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似乎构成了一个矛盾。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雾月十八日》这个文本的重要意义就由此得到了凸显。我们怎么来理解上层建筑像这种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它是如何出场的？他为什么会膨胀？它是不是违背了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的这段历史是今天世界历史学研究当中的非常大的一个热点问题。世界史研究有几个很很重要的热点，一个是研究罗马帝国为什么解体、为什么崩溃？这个很多人在研究，还有很多人都在研究法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搞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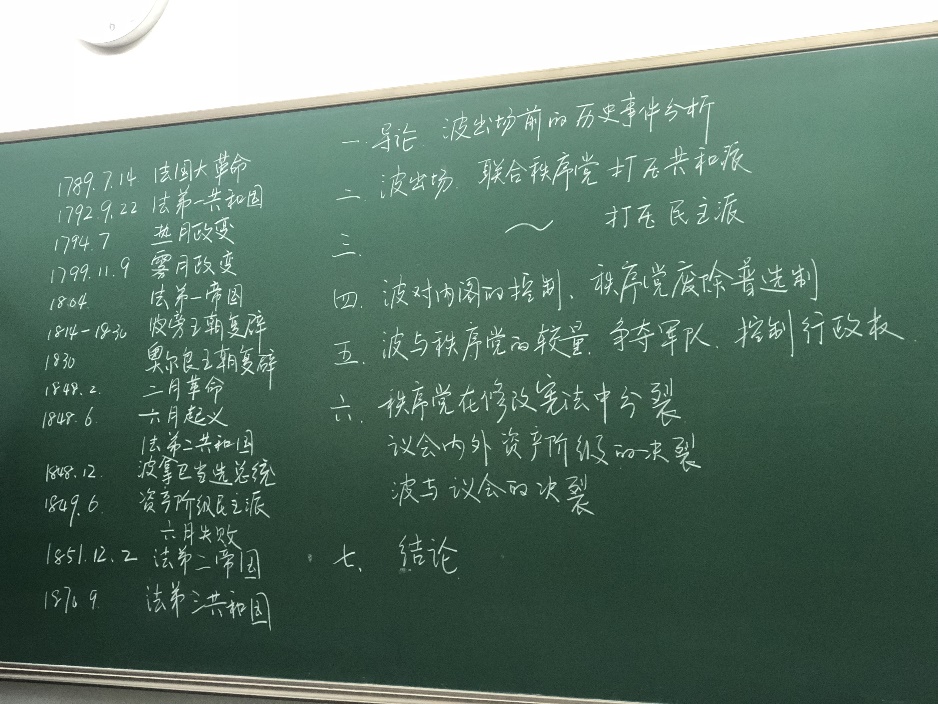
最近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国革命史的史学家，这个人叫做傅勒，傅勒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这本书非常的重要，这本书把马克思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所有的论述作了一个汇总，然后傅勒亲自写了序言，然后傅勒就讲马克思对于法国革命有刚才我所提到的三本书。《1848到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这三本书傅勒说在这三本书里面，马克思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一个如此之早形成的，但却如此不能掌控其政治历史的市民社会？什么意思？就这三本书都在讲一个问题，就法国的市民社会为什么那么的弱？它出现得很早，但是他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它总是被国家机构、被官僚体系、被中央集权所压制住，这就是傅勒所觉得这是马克思对于法国革命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和路径。那么这样的一种视角，这样的一种路径到了路易波拿巴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典型，叫做波拿巴主义。

波拿巴主义就是现代国家权力异化到了极致的一种形态。这个国家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国家。这个是路易波拿巴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主义，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或者说是法国版的一种威权主义。波拿巴的伯父就是拿破仑，他是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被流放了以后，被下台了以后，波拿巴也是在流亡，波拿巴在流亡的时候就专门写了一本书，非常的重要叫做《拿破仑观念》。在这个《拿破仑观念》里面，路易波拿巴把他的伯父的治国理念做了一个系统的阐释，做了一个什么系统的阐释呢？路易波拿巴讲，拿破仑带给欧洲的不是战争，因为很多人觉得拿破仑就是一个战争狂人，在欧洲到处作战，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波拿巴说，拿破仑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军事家，而影响了欧洲的历史世界的历史，而是因为拿破仑提出了一整套的治国理念。那么拿破仑提供了哪些治国理念？

首先第一点，拿破仑提出来：要让法兰西再次伟大，要实现法兰西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是拿破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波拿巴继承了拿破仑这样的观点，所以他在外交上面采取了扩张政策。法国在波拿巴时期也开始建立起了自己的殖民地，这个在法国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的。扩张政策，外交上的扩张，然后拿破仑提供什么？拿破仑建立起了皇帝制度，建立起了中央集权，波拿巴认为这种中央集权是非常必要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良好的治理必须依赖于官僚机构，依赖于国家机器，依赖于这样的一种威权体系，没有威权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繁荣。

然后波拿巴讲拿破仑还提供了一种法制的理念，这种稳定不仅需要威权，而且还需要法治。大家知道拿破仑制定了法典，有民法典，还有商法典，法制来进行治理。除此以外，除了外交上的民族复兴外交扩张，中央集权，官僚治国，除了这些理念以外，除了法制以外，拿破仑还有一个什么样重要的贡献、治国理念呢？就是他提出来要完成阶层之间的合作和谐，各个阶层不要分裂，不要对抗，我们这个社会要团结起来。路易波拿巴不是随便说说的，他在流亡期间还写了一本书叫《消除贫困》。专门来讲法国内部的工人的贫困问题怎么消除。通过阶级的调和来完成对于工人贫困现象的消除，让他们不要造反，做大经济的蛋糕，来实现维稳。所以说路易波拿巴继承了这样的一种观点以后，路易波拿巴在称帝以后复辟以后，在国内他特别重视一点，他特别重视各个阶级之间的平衡。所以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这本书里面讽刺波拿巴说，波拿巴变成了各个阶级的恩人。也就是说民族复兴，阶级扩张，依法治国，社会团结、阶层调和，消除贫困，对吧？大家想想挺有意思的，路易波拿巴不得不和我们今天所处的一种现实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但我就不能多讲了。那么这就是形成了一种波拿巴主义。马克思在他的序言里面曾经提到，这种波拿巴主义已经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它不是说对法国有影响，它对德国也产生了一种影响。德国也出现了一个变种的波拿巴主义，叫什么？叫凯撒主义。强调威权。这种威权这种体系，马克思在这个书里面把它形象地称之为叫什么？叫做行政权支配社会。那么这种行政权支配社会这种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它是如何出场的？波拿巴主义是怎么来形成的，这就是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当中要给我们重点分析的。

马克思思考的的特点，就在于马克思要对波拿巴主义这种行政权支配社会这样的一种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相对独立性，这样的一种上层建筑过分膨胀的现象，来进行分析。这个分析实际上也是法国大革命当中所出现的一个结构性的特点。



我们为了帮助大家阅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专门罗列了一个时间轴。那么大家会发现，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法兰西的第三共和国，在这个过程当中，法国无数次地出现了同一件事情，就是在走向共和的过程当中，总是出现了帝制的复辟。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思想界史学界对于法国革命的很多研究，聚焦于的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走向共和的过程当中，法国革命为什么老是出现帝制的复辟。第二个就是，法国革命为什么如此的动荡、不稳定，像走马灯一样的，形成了一种不断革命的态势，它不像英国那么的稳定。那么这两个问题也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

一、托克维尔的分析

那我们知道跟马克思同时代有一个人，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思想家，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要学他的著作，这个人叫托克维尔。托克维尔也专门研究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来谈一谈托克维尔和马克思这样的一种理解，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异？

我们首先来看，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是同时代人，但是马克思对于《雾月十八日》的理解、分析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在这些著作里面，马克思提到了维克多·雨果的书；对于波拿巴的分析，马克思提到了蒲鲁东《政变》这本书。这两个人的书是注意到了，但马克思唯独没有注意到托克维尔。在马克思的这个文本世界当中，托克维尔这么一个我们现在看来很牛的思想家，似乎是一个空白，没有出现过，马克思好像根本就不care中的一个人，为什么？

路子不一样，思路不一样。托克维尔我们大家知道，他就是1848年革命的当事人。1848年革命的时候，托克维尔积极参与，然后在1849年托克维尔还专门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部长。波拿巴复辟成为皇帝了以后，托克维尔愤然辞职。然后托克维尔就写了大量的关于法国革命的一些书。我们讲托克维尔关于法国革命的书有三本，第一本我们知道，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本就是了《民主在美国》，也就是《论美国的民主》。 第三本就是《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当然托克维尔的回忆录马克思是看不到的，因为在托克维尔生前就没有出版过。我们大家会发现《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就讲了1848年到1851年这短短的这个时间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你会发现托克维尔在这个书里面对于这段时间的历史，他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分析，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都是一些回忆，都是一些片段，但是对于这个事情进行一个整体上的把握，是如何的这种形成了一种因果的链条，如何的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托克维尔都没有。为什么？

托克维尔跟马克思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他所关注的是这一段时间。而托克维尔认为要理解1848年的革命，要理解波拿巴的复辟，必须要上溯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也就是说托克维尔更加关注的是这一段，更加关注回溯这样的一个传统。//

那么，托克维尔得出的一些基本的观点、结论是什么呢？首先，托克维尔通过这样的一个对于1848年之前革命的追溯，首先发现第一个事情，法国的中央集权制的传统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强悍。托克维尔又发现第二件事情，由于中央集权制的传统的强大，所以使得法国革命当中不断出现了自由与秩序之间的来回的摇摆，不断的想回归到秩序，回归到中央集权，回归到帝制的复辟，这是托克维尔的对于为什么会复辟的一个解释。

托克维尔更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老是会发生革命？因为托克维尔发现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在于自由，或者说平等，它和秩序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峙关系。托克维尔认为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的矛盾。现代社会强调的是平等，强调的是各个阶层的人都要获得他的自由，“无套裤汉”也要获得他的权利，也要获得他的自由。这种普遍的平等普遍的自由，就是把底层人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的热情给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出来。而在长期的君主专制的时代，这样的一种政治参与的热情是被充分地压制住的。随着改革的启动，这样的一种热情迅速的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亨廷顿后来所讲的政治参与的爆炸。所以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里面他讲，法国的革命不是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面发生的，法国的革命恰恰是在法国处于上升期所发生的，所以他认为法国革命的原因根本不是阶级之间的对立，也不是社会的普遍的贫困。法国革命的原因是什么？法国革命的原因是在于，中央集权这种强大的传统和民众之间这种追求自由、追求平等的参与爆炸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对立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托克维尔根本跟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是根本的不一样，马克思是强调社会阶级的分析，而托克维尔根本就不关注这一块。他认为社会阶级的存在是存在的，但社会经济都在追求自己的权利，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平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冲击了这种秩序。但中央集权这种秩序又必须要存在，所以构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 //

那么托克维尔最后的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是依据两个方案。这两个这是构成了托克维尔为什么去考察美国、考察民主在美国的非常重要的动机。第一个就是形成合理的央地关系，在这一点上他把美国看成是一个样本。因为美国搞的是联手自制，美国的地方上的联邦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管理的体系、治理的体系，但是美国又形成了一个Unity，又形成了一个统一体。他认为美国在处理央地关系上面特别好，所以托克维尔特别关注美国的地方、美国的基层、美国的这种城镇是怎么来陶冶美国人的这种爱国主义、平等精神、民主追求的。/

所以托克维尔又关注第二个问题，在这个央地关系的背后，托克维尔更加关注的是什么？这个概念是托克维尔政治的核心，叫做民情，说白了就是老百姓的素质。怎么进行陶冶？托克尔就发现，美国人是怎么在这个自由和秩序之间取得一种稳定的，这恰恰就是法国所缺乏的。因为法国在中央集权跟参与爆炸这样的一个反复拉锯当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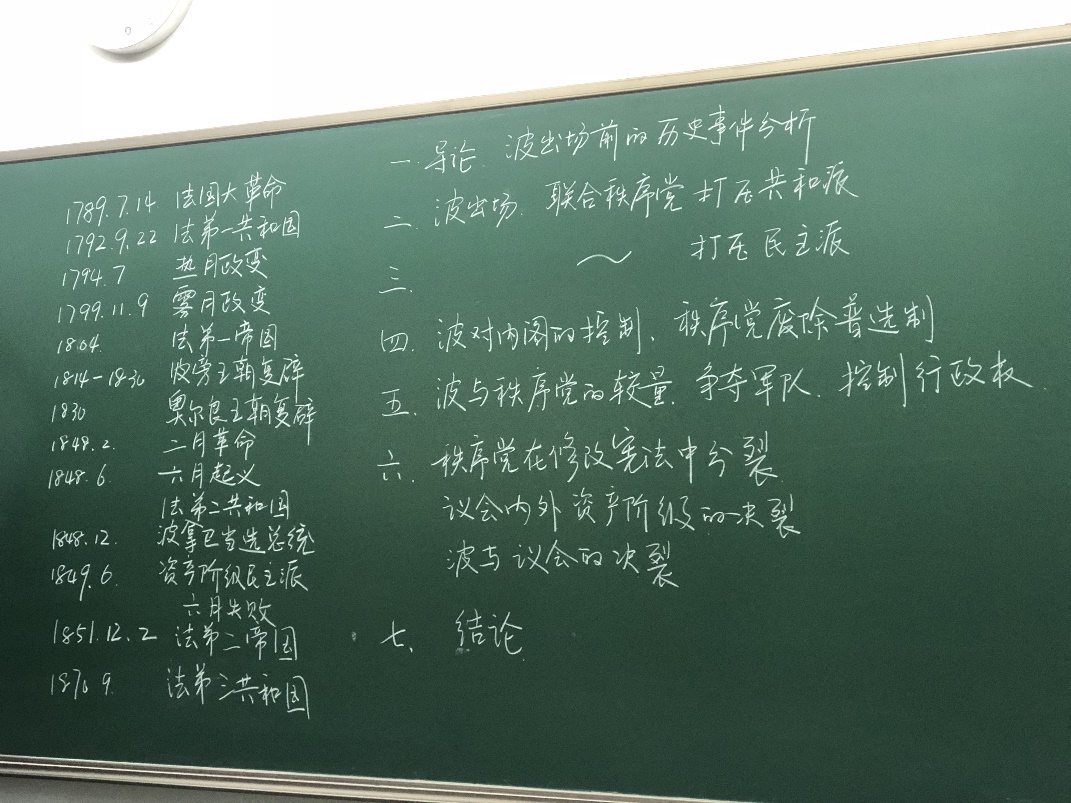
这种民情是什么呢？就是走极端，来回的摇摆。对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描述。托克维尔说，如果说英国推崇经验与契约，德国崇尚理性与秩序，那么法国则弥漫着激情与叛逆。就是说，法国的民情完全就是由passion、由激情来进行支配。他说法国这个民族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在行动中如此充满了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任感情摆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好或更坏，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就好，要么好的不得了，坏要么坏的不得了。他们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致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甚至对刚刚做过的事情，常常会像陌生人那样感到吃惊，这个事情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时，他们最喜欢深居简出；一旦有人把他从习惯中拉出来，他就准备走到天涯海角无所畏惧。他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嚣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他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天生就最适于变化，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仇恨，时而令人怜悯，时而令人恐怖。正是这种矛盾特质的交质，最终点燃了整个法兰西民族的熊熊烈火，造就了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而又如此充满矛盾反复和对立的革命。这就写的就是北大，是吧？就他好走极端。

所以托克维尔特别关注的是这个民情，所以托克维尔在写《民主在美国》的时候，也就是关注的是美国人的民情是怎么样子的，这种民情是在一种央地关系的合理妥善的解决当中养成的。所以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的关注点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道理？也有他的道理。那么我们讲这个是托克维尔观察法国革命的一个坐标。

二、马克思的分析

那么你会发现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当中，对于托克维尔所讲的中央集权的传统问题，对于托克维尔所讲的自由和秩序之间的矛盾的问题，马克思其实也有涉及。不是说马克思一点都不涉及，也有涉及，但是马克思的坐标和他的坐标不一样。就两个人带着两副不同的眼镜来看同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个是托克维尔的一种分析，马克思他也关注这些问题，那马克思跟托克维尔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很大的不同，我们接下来将会谈到。

马克思更加关心的是1848年到1851年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恰恰是托克维尔的盲点。按照托克维尔的这种解释，秩序与自由的永恒矛盾、法兰西民情的深厚传统、中央集权的庞大力量，这些都是一种长期的或者说是一种传统性的因素，这个固然贯穿在从1789年到1870年这些波澜壮阔的法国革命的历史征程之中，但是大家会发现它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他没办法解释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有什么区别、第一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托克维尔他的这套框架可以解释整个法国革命的一种连续性，但他没办法给我们揭示出来路易波拿巴的特殊性，这个恰恰是马克思所关注的。所以马克思更加关注的是这段时间。所以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这种关注，在序言里面写了这么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说，他对活生生的实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马克思不是那种长时段的观察，马克思就关心1848年到1850年这段时间。在这个事变刚刚发生，马克思就能做出透彻的观察和分析。//



那么，马克思的观察和分析是怎么来做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对于路易波拿巴的这样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发现《雾月十八日》一共有七章主要的线索。我给大家都罗列出来了，大家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线索来把握。

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是对于波拿巴出场以前历史事件的分析，也就是从2月革命谈到6月，谈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建立。然后第二章开始讲，波拿巴成为了总统，开始联合秩序党，打压共和派。 第三章讲波拿巴联合秩序派倒打压民主派。第四章讲波拿巴对于内阁的控制，秩序党废除了普选制。第五章讲波拿巴跟秩序党在进行较量，争夺军队控制行政权。第六章讲秩序党在修改宪法当中的分裂、议会内外资产阶级的决裂，以及波拿巴和议会之间的决裂。整个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之前讲了一件什么事情？马克思讲的是，首先，波拉巴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当选为了总统；当选为了总统以后，在法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当中，波拿巴如何的拉一派打一派，最后逐步逐步的完成了行政权对于立法权的主导，完成了波拿巴这个皇帝对于共和议会的全面的压制，对于宪法的胜利；最后波拿巴成功复辟，建立起了法兰西的第二帝国。也就是说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波拿巴是怎么变成皇帝、一步登天的。//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马克思核心的问题，马克思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波拿巴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地到达了这样的一种巅峰时刻。马克思在这个书里面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波拿巴怎么从一个平庸的可笑的人物突然变成了英雄？这个东西就是马克思所想的。波拿巴曾经对秩序党人说过一句话，他对秩序党人说，你们把我看成了蚂蚁，但迟早有一天我要向你们证明我是一头狮子。所以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就讲，像波拉巴这样的烂小人是怎么从蚂蚁变成狮子的，他是怎么来走上最高权力的。

对此当时出现了两个著作。一个著作就是雨果的《政变记》，还有一个著作就是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这两本书怎么写的？这两本书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波拿巴真的成为了皇帝，建立起了第二帝国，让所有的欧洲社会眼镜大跌。法国人觉得自己被凌辱了，像托克维尔这样的人就受不了。追求共和，一辈子，突然来了一个皇帝，是吧？他来当皇帝了，共和革命一下子就化为乌有。所以大家都觉得法国被羞辱，我们被羞辱了。然后大家就开始骂波拿巴。于是雨果就对波拿巴画了一幅漫画，就是波拿巴这个人怎么不堪，怎么不可！然后蒲鲁东就讲了，波拿巴这个人是怎么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然后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地位。

马克思读了这两本书，突然讲了一件事情，说，这两本书的共同点在于什么地方？小骂，帮大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本书都把波拿巴写成了如此不堪，但就是这么一个如此不堪的人却成为了皇帝，这不就证明了他的强大和神奇吗？所以说马克思对于蒲鲁东的这两本书，对于这样的一个1848年革命、波拉巴复辟的分析，是不满意的。

那么马克思要讲一件什么事情呢？马克思在自己的序言里面讲的很清楚，而是说我的这本书关键要干一件什么事情呢，是要证明法国的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的英雄的角色。啥意思？时势造英雄。就这个人这么low，他为什么能在这个位置，这个完全是时势的使然。马克思就要分析这样的一种阶级斗争，怎么创造了这样一种条件和情形，让这样的人从蚂蚁变成了狮子，这个是《雾月十八日》的分析。//

所以在这个分析的过程当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框架。首先我们来看，从表面上看就是行动者，就是像路易波拿巴这样的这一出大戏的主角。他是一个行动者。这个行动者背后是什么呢？是情势，马克思《雾月十八日》第二个分析的维度非常重要。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结构。这个结构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法国的这样的一种阶级格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这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背后的更加深层次的社会根源，这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要素。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波拿巴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到达这样的地位，这不是他个人的才干、个人的品行所决定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结构、法国的独特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那么我们从行动者到情势到结构，我们会发现马克思是一步一步的递进，走向这个社会世界的深处。

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个行动者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马克思看不起波拿巴，说他是蚂蚁，是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但这个人的确也有他的过人之处。这样的一些行动者给这样的一种历史戏剧注入了一种偶然性的色彩和多变性的色彩。但是波拿巴能够到达这样的位置，离不开这个情势的配合。这个情势是什么？就是历史的条件。各种历史条件的因素，使得波拿巴上台。

但是请大家注意，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这个结构本身是什么样子的，马克思更加关心的是这个结构是如何运动、变化的。请大家注意，马克思不是说搞出一个静止的结构，做一个结构的分析。马克思关注的是这个结构组成，这个结构的这些力量互相之间是如何在这个情势当中互动的，以至于行动者上演了这样的一幕政治戏剧。这个是马克思的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短期因素，这个是中期因素，这个是长期因素。所以马克思把这三个时段的分析结合的很好，所以后来布罗代尔的年鉴派提出三个时段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这样的一个《雾月十八日》的影响。//

那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行动者。波拿巴作为一个行动者，我们讲他有三个身份，扮演了三个角色。这三个角色在这个革命的不同的历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第一个，波拿巴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什么呢？投机分子。马克思把波拿巴形容成为，具有一种海盗的固执的意志。他像海盗一样，他到处投机。这种投机性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得非常的明显，拉一派打一派，他没有原则，只有利益。对我的权力巩固有好处的，我就拉拢，没好处的我就打压。这个是波拿巴的第一种形象。

波拿巴的第二个形象是什么呢？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流氓无产阶级指的是什么？就是12月2日党人，在《雾月十八日》里面叫做12月10日会这个派系。波拿巴通过这样的一个派系来掌握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依靠流氓无产阶级组成别动队，掌握了军队。由于他掌握了军队，所以他最后赢得了跟秩序党人的对决，赢得了跟议会的对决。这是波拿巴的第二个角色。

第三个角色是什么？第三个角色就是小农阶级的代言人，为什么是小农的代言人？这个我们接下来还要讲到，先放在这里不讲。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波拿巴也不会有他的群众基础。大家注意，波拿巴不仅是靠投机打一派，拉一派，来获得最高权力的，也不光是靠机枪板子，更重要的是他也是某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他有他的群众基础。所以大家会发现波拿巴的第三个角色就跟这个结构、这个阶级是有关系的。那么波拿巴的前两个角色，尤其是他那种投机的这种角色，跟这种形势是有关系。//

我们首先来讲波拿巴为什么能当选为总统。在1848年的12月2日，波拉当选为了总统，他为什么能够当选总统？波拉巴当选总统，这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这谁都没有，他是一匹黑马，谁都没有想到波拿巴能够成为总统。但是呢波拿巴取得了胜利，是因为他的对手都是猪一样的对手。

当时有一个候选人，跟波拿巴一块的一个候选人叫卡芬雅克。这个卡芬雅克就是6月起义的镇压者。6月起义是法国的无产阶级超出之前的准备，所以这一开始就注定了法国的无产阶级是要失败的。但是呢卡芬雅克就镇压了这个6月起义，所以说卡芬雅克要选总统的时候，法国的无产阶级、工人那肯定是誓死反抗。所以卡芬雅克这个人也不讨人喜欢。当时法国的农村里面流行这样的一首歌曲，如果你要想选一个刽子手的话，你就选卡芬雅克，如果你要想选一个流氓的话，你就选一个谁谁谁，如果你想选一个坏蛋的话，你选一个谁谁谁，如果你想选一个好人的话，你就选波拿巴。波拉巴为什么能够当选这样的一个总统，就是他跟卡芬雅克这样的人不一样，卡芬雅克手上沾满了某一个阶级的鲜血，但波拿巴这个时候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形象，各方面都能接受他。所以在这种形势下面，波拿巴出乎意料地成为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这个就是情势在这件事情中起到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这个情势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条件，既有法国内部的阶级利益之间的此起彼伏，也有当时1851年经济危机的对于法国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说内外的情形反复的交织，使得这样的一个结构能够影响到这样一个形势，使得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得到了一个呈现。 //

那么接下来马克思就分析，波拿巴为什么能够从总统变成了皇帝？这个就进入到一个结构性的分析。这个结构有两个原因非常关键。

第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的下降路线。革命的下降路线是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第三章里面，专门一开头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马克思说，把1848年以来的这个革命跟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作一个比较的话，他突然发现第一次法国革命是革命的上升路线。马克思说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杰伦特派的统治，杰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至于他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他后面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啥意思？就在马克思看来，第一次法国革命就是大家都在追求进步，然后一开始是这个立宪派，完了以后杰伦特派觉得立宪派还不够进步，把立宪派推翻我来干。杰伦特派干了以后，雅各宾派发现你杰伦特派也很反动，接着把你干掉，接着往前推进，这个是不断的上升的。

但是在1848年革命，马克思说这却是下降的。马克思说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他。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自己站稳了脚跟，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人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了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他还一直以为他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他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俯在挤着他后退的党派身上，这就是革命的下降路线。

什么意思？就一个比一个反动。因为按照革命的先进性、革命的彻底性来讲的话，马克思说，最具有革命性的应该是谁？最具有革命性的应当是无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在6月起义后就被废掉了，随后出场的就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派，结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被干掉了。随后就是资产阶级的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共和派还讲究宪法，还讲究立解，随后又被干掉了，最后取而代之的是什么？秩序党人。秩序党人就想恢复封建，恢复封建的贵族利益这样一个秩序，结果秩序党人后来又被干掉，最后出来了波拿巴，代表军队，代表皇帝。马克思说这是一个比一个不如，在革命性上面一个比一个后退。

革命的下降路线这个分析其实是非常深刻的。深刻在什么地方？深刻在，这样的一条革命的下降路线，其实是打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所说的那个脸。因为按照《共产党宣言》里面所讲的，所有的社会到最后都会变成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然后无产阶级必然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然赢得革命。

所以1848年刚刚看到革命的时候，马克思那个激动啊兴奋啊，无产阶级要登场了！但是他发现1848年在法国，无产阶级却被人抛弃了。波拿巴为什么能够上台？波拿巴的上台就是因为这几个阶级之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完成当时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不行，资产阶级也不行。马克思怎么分析的？比如说，在6月起义当中就已经决定无产阶级的失败，因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强调一件事情，说无产阶级不代表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它代表的是普遍利益，全社会的利益，对吧？但就是这样一个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无产阶级，却在6月起义当中变成了全社会的公敌。大家读一读《雾月十八日》，就会发现，6月起义里面无产阶级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形。马克思是这么说的，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他自己。什么意思呢？无产阶级在6月起义当中沦为了孤家寡人，他有很多地方是不成熟的。比方讲他把农民给得罪了。无产阶级在6月起以后组建了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提出了一个措施，叫做增加税收，这就让农民感到负担沉重，所以农民就不支持无产阶级。挨着无产阶级最近的农民都不支持无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在6月起义当中完全就是一个孤家寡人。

而且无产阶级还有一种浪漫的幻想。当时工人阶级通过6月起义组建临时政府以后，提出了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让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啥意思？资本家我们也要让他活，小资产者我们也要让他活，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社会所有的人都来活，结果社会上所有的人都不买账。

所以说这个无产阶级在当时，第一个他的力量是弱小的，第二个他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这是没有关系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如何觉醒，就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来获得自己的决心，来获得自己的成长，来解决自己too young too simple这样的问题。但是马克思说，当时法国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无产阶级只是法国的极少数，只集中在城市里面，无产阶级被淹没在庞大的法国的农民阶级当中，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

马克思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是什么？他是摇摆的，他是两面派，哪儿有利它就投靠哪儿，为什么？因为他唯利是图。马克思说这批人是什么？这批人是有热情而没有真理，不断的摇摆，谁的腿粗他就抱谁，不断地投靠，所以这一派也不成熟，最后也被别人抛弃。

那好，我们再来讲资产阶级的共和派。马克思也说了，这是一个自杀的阶级力量。共和派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共和派在1848年革命当中，起草了一部叫做《共和主义的宪法》。大家知道马克思是学法学出身的，马克思把这部宪法认认真真研究发现以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部宪法完全是一个自杀的宪法。这个非常像施密特对于魏玛宪法的分析。那么共和派的这个宪法的自杀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当中有一段话是这么来说的，他说资产阶级承认他本身的利益，要求他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啥意思呢？资产阶级追求的是自己利益的稳定，他们想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利益的稳定。但是这样的一个宪法要求资产阶级专政，要求资产阶级掌握权力，要求资产阶级来进行统治，但是这种统治是有风险的，资产阶级不愿意冒这样一个风险，不愿意冒这样的一个风险，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奇怪的结局？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他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让国内太平。资产阶级要利益，要稳定，要和谐，就要让资产阶级的议会保持安静，什么意思？资产阶级闭嘴交出权力。所以这个宪法完全就是资产阶级自杀的一个宪法。这个宪法的自杀性，马克思讲的很深刻。因为资产阶级讲什么？讲普世价值，讲普遍平等，讲普遍权利。马克思就分析了，当资产阶级一旦强调这种所有人都拥有这样的自然权利，都拥有这样的一种平等人权的时候，其实资产阶级当权者也就通过宪法赋予了它的反对派以同样的政治权利，对不对？我资产阶级我享受这样的一些自由民主平等，无产阶级你也享受这样的权利。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所有的跟资产阶级不对付的，其他的阶级也同样享受这样的一个权利。也就是说社会权利的全面的释放，最终却危及了他自身权力的巩固。然后其他的跟资产阶级不对付的，其他的这些阶级，都在利用资产阶级制定出来的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跟资产阶级抗衡。所以马克思说这个就是一部自杀的宪法。从这个自杀的宪法也就可以看得出来，资产阶级共和派也是在政治上不成熟的。所以马克思对于共和派所提出来的什么普选权、所讲的这些宪法，是不以为然的，因为这个完全是自杀的。

然后再讲秩序党人也是不堪的。秩序党人自以为拥有枪杆子，但他却不知道这个枪杆子被掌握在波拿巴的手里面，产生了一种自己坐在武装力量肩膀上的感觉。他一味地投靠波拿巴，结果没想到他想找的靠山突然变成了火山，想依靠的肩膀突然变成了尖刀，插进了自己。所以说没有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是成熟的。

这是马克思分析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波拿巴之所以能够变成皇帝，能够变成皇帝，不是因为波拿巴太强大，而是因为没有一个阶级强大成熟，独立到可以完成统一法兰西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波拿巴成为皇帝都靠猪队友的帮忙。那么这样的一些事情背后说出了什么事情？在这个情势后面，说出了法国社会和英国的一个巨大的差距。什么差距？法国的社会阶级非常的多样化，不像英国社会那么的简单，就是资本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那么的纯粹，存在着多种阶级之间的互相的博弈，以至于没有一个阶级是强大的、稳定的。这个就是法国的阶级结构上的一个特殊性。这种阶级结构的特殊性，也就说明法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工业化、法国的资本主义化，还没有发展到像英国这样的一种纯粹的这样的一种程度。所以在这种局面下面，每一个阶级的不成熟不稳定，就给了波拿巴以巨大的操作空间，所以波拿巴可以提出阶级的整合，可以提出社会的团结，可以来扮演各个阶级的恩人。对于无产阶级，他就讲，我要消除贫困；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讲，我要给你们稳定的环境，让你们安居乐业；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他又讲了，我要给你们法制；对于秩序派跟你们讲，我给你们秩序。他变成了所有的阶级的这样的一个恩人，为什么？没有一个阶级是成熟的，是壮大的，是独以垄断法国政治的。这就是法国。它的这种阶级格局所背后体现出来的，它不如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纯粹成熟彻底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更加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就是小农阶级的存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面，有一段话是非常关键的。马克思说，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就是小农。啥意思？就是波拿巴他之所以能够复辟成功，并不因为其他的阶级不行，他不是单纯依靠这个因素。人家也有自己的地盘，人家也有自己的阶级基础，这个阶级基础就是小农阶级。小农阶级对于波拿巴政权的支持，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决定性的作用是在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小农这个阶级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是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它分散，第二个它需要阶级利益上的代言人。因此小农阶级必然会维护帝制，必然会需要一个皇帝的出现。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分析的？

马克思接下来有大量的分析，下节课继续。

#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期3 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把握3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2019.9.25

**注：列表层次 1. — A — (1) — (a) — (a1) — (a11) — etc.**

我们之所以关注《雾月十八日》，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文本是马克思所有著作中前所未有揭示出**上层建筑的复杂性**的。只有在雾月十八日中，他才如此强调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它非常突出阐释了法国革命的一个现象：**国家的相对独立性**。这和我们以往所理解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很大区别。我们以往认为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就是政治国家的逻辑由市民社会决定，市民社会是由资产者的个人利益的绝对保护构建起来的，政治国家对于市民社会来讲是没有独立性的，是市民社会利益共同体的产物、附庸，顶多是保护者。这种保护者最经典的形象是守夜人的形象：自由主义的，国家的最小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市民社会是具有优先性的。但这在法国革命、波拿巴主义当中出现了问题：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这样一种独立性，就是所谓的波拿巴主义，也就是很多今天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威权主义。波拿巴主义不是孤例。强调政治的上层建筑，比如凯撒主义、俾斯麦主义、新加坡模式等。这样的现象怎么进行理解？马克思就从波拿巴当选总统到复辟建立第三帝国的过程入手分析。

马克思之所以写《雾月十八日》，是因为当时出现了蒲鲁东和雨果对波拿巴上台的分析。这样的分析马克思不满意，因为这些分析都是讲波拿巴是怎么一个强奸法国的烂小人。马克思说，你们把波拿巴写得越不堪，他本事越大。如此不堪的一个人，怎么能凌驾于整个法国之上完成复辟？

马克思对波拿巴的分析有三个层次：**行动者**的三个角色：**流氓无产阶级、政治投机分子、小农阶级的代言人**。这个行动者背后，是当时法国革命的具体**情势**。这个情势背后实际上是一个**结构**。马克思希望把对波拿巴这个人的分析转化为对法国社会结构的分析。“不是波拿巴太优秀、太有智慧了，而是法国独特的政治结构、阶级结构，决定了波拿巴可以从蚂蚁变成虱子。时势造英雄，分析的是背后的结果。

这样一种国家相对独立性的结构，马克思主要是从阶级结构来分析的。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之所以出现，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1.** **革命的下降路线**。革命的下降路线是相对于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革命的上升路线”来讲的。所谓革命的上升路线，就是原先有一个阶层代表了革命的方向，然后落后被下一个革命主导阶层代替，又被淘汰，不断更加能往更先进、更阶级的阶级走，推动革命的彻底发展。但是，从1848年革命（六月起义）开始，马克思发现，轮番登场的各个阶级主导的顺序恰恰是逆转的。不是专制向民主跃升，而是民主向专制倒退。

**A** 首先是**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最先进、革命性最彻底。但它在六月起义率先登场并很快被镇压，无产阶级就退居幕后。那么，为什么六月起义无产阶级它不行？——有2个原因：

(1) 首先是**力量上势单力薄**。六月起义，就是整个社会所有的阶级、阶层都在反对无产阶级（工人）。工人当时变成了法国社会的极少数。这里最耐人寻味的是，原本应当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同盟军——农民，被在六月起义中得罪了。因为工人阶级希望增加税收以向资产阶级收税，从而提高整个公共财政用于社会化的福利分配，但这个收税群体却面向农民。农民当时经济负担有2重：资本家的剥削（土地债权）和税负加重。在这种双重打击中，农民对税收非常敏感，不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通过和农民利益上的决裂，陷入了孤家寡人。当时的法国，工人阶级处于极少数的状态。大家把握1848年革命、《共产党宣言》，一定要明白，从1845~1848年，这样的欧洲形势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欧洲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家对于共产党宣言、1848年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斗争，都要明白一个概念——在当时欧洲，只有英国彻底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英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它的生产力是最发达的。与此同时，法国的工业革命并未完成，遑论德国。这和我们今天的欧洲是两回事。当时的法国现状，是小农生产占据主导地位。法国民众中大部分都是小农阶级而非无产阶级，因为没有彻底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只有彻底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结构才会变得纯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才会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成为国家政治当中的绝大多数。但当时法国，这是极少数。我们理解《共产党宣言》一定要理解这个背景，其伟大和失败之处都在于此。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的伟大之处在于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期、只有英国成为世界工厂、资本主义工业化还没有全面展开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率先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失败之处则在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逻辑是无产阶级之所以会革命是因为其人数众多、绝对贫困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必然陷入沙漏型的社会结构，一头是资产阶级，一头是无产阶级，社会阶级对抗会简单化，然后随着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引发阶级之间的决战；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变成沙漏型社会结构，而是变成了纺锤形——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海外殖民、全球资本主义扩展，使得无产阶级变成了工人贵族、蓝领中产阶级，没有陷入绝对贫困化，没有陷入阶级对立的简单化。为什么会这样？后来，马克思通过一系列失败一直在认识这一点。1848年革命、1850s的金融危机、1872巴黎公社，马克思一次次期待革命的到来，结果被世界干得服服帖帖。革命没有如期到来。1858~1859年，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不会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不那么乐观。《共产党宣言》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刚刚处于上升期，潜力还没完全释放出来。所以这时候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还是非常肤浅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分析也是非常肤浅的。这个肤浅我们之后还是会讲到。但是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宣言》虽然失败但同时也是一本伟大的书——它已经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内部不可化解的矛盾。吊诡的是，当无产阶级在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如期到来的现实下，马克思主义仍然像幽灵一样游荡在上空。90年代苏联解体，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提出，是马哲研究非常黯淡的一段时候，似乎社会主义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然而，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把《共产党宣言》的顺序颠倒过来：马克思本来讲从“一个幽灵，在欧洲的上空游荡”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本来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幽灵如何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中出场，并变成一个具体的斗争者，变成历史的主体——从幽灵变成实在的主体，幽灵把自身显现出来。然而，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力还在发展，幽灵没有显现，德里达说，虽然无产阶级不再作为历史主体，不能再给我们带来十月革命这样的事件，但它仍然回到了幽灵状态，游荡在资本主义上空。所以，人类的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1848年，法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是非常弱小的。所以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讲了一句话，后来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本来中国共产党也是以工人为主体，但当时中国产业工人200万都不到。后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广州赣州“讲习所”、工农联盟……基础都是马克思的这句话：“农民占主体的国度中，如果工人不和农民联合，就孤鸿哀鸣。”

(2) 无产阶级当时的失败，首先在于力量的弱小，与此同时，其**水平**也不行。说白了是幼稚。“无产阶级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推翻之，而是躲在其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救，所以必然是要失败的。”这句话中，马克思讲了两条工人阶级的稚嫩：(a) 醉心于**教条的实验**；(b) 采用**私人的办法**。(a) 马克思所说的教条的实验，就是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者**。傅里叶、欧文等人一直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特需，按需分配，生产资料公共化，过共产主义生活。美国今天有些地方还在受到欧文主义的理想搞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这种实验不会成功，因为马克思讲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场社会变革，不是用搞实验的方法完成的，需要的是**革命**。革命是教条的实验的对立面。革命意味着要**总体化**。实验是局部性的，只不过在资本主义范围之内来一个锦上添花，起到可有可无的点缀作用，而不是把链条砸碎。而且，不仅是局部性的实验，而且是教条的实验，先有教条再付诸实践。这个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说，“不要问我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共产主义是在实践中诞生的，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不要以为先有一个对共产主义的想象（按需分配、物质极大丰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终结等等规定性）——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实践的运动，在到来的时候自然会展现给你怎样的景象。

蒲鲁东主义也是如此：做一种成立**交换银行**的实验。蒲鲁东正确意识到，所有的劳动都在被资本剥削，所以他说，“我们的劳动能不能直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取社会产品，而不需要经过资本/货币的中介？”他说，要取消货币。凭自己的劳动，我今天上班8小时，就凭借8小时的劳动券直接参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工人在经济上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劳动直接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但是马克思一针见血指出：“你们虽然消灭了货币，但把劳动变成了货币。”货币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货币仍然还在。因为货币是一种社会力量，是社会发展产生的客观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主观上想取消就取消掉。改变的只是货币的形态而没有消灭货币本身。所以马克思把蒲鲁东的交换银行、工人团体也看成一种实验。也是“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推翻旧世界”。先试点后推广（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就是这样的实验？张祥龙老师就想，中国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拿出来搞一个儒家的特区，按儒家方式去生活？（山东）这就是教条的实验。

实验就意味着**“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推翻旧世界”**，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总体化的革命，是在占据旧世界一切发达的手段的前提下得以完成的。比如，旧世界所有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当然应该拿下，运用国家机器、国家暴力来杂碎旧世界、重建新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不要国家机器，而是利用国家机器再打碎国家机器。旧世界的手段当然要——旧世界的手段，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成果。必须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成果基础上进行革命。革命不是生产力的倒退。例如，资本主义货币关系作为商品交换的发达关系，当然我们要在占有货币的基础上才能消灭货币，而不是否认、取消货币。包括对于资本，也是如此。我们是要在占据资本的基础上再来消灭资本。这一点就非常关键。要运用旧世界的一切来反对旧世界。

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重要的**革命辩证法**：**“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训练出来的、造就出来的。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产物，利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成果来推翻资本主义。我的导师丰子毅老师评价我说“我培养了我自己的一个掘墓人”，就是这样。资本主义分工的方式是高度组织化机器化的，无产阶级在大工业条件下要具有这种组织性、纪律性。不是散兵游勇，而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训出来的。

《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一切革命动力、革命潜能，都是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这就是非常重要的**革命辩证法**。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已有成果来反对资本主义。教条实验的局限性，就是排斥了一切资本主义成果。这是当时无产阶级水平不高的一方面。

(b) 另一方面，用私人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的矛盾。这里马克思提出一对概念：**私人与社会**。私人的办法，就是“在自身有限生存条件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救”，企图躲在社会的背后。要理解这句话，仍然要回到《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代表的是这个社会的普遍利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最大区别，是其是一个最终的阶级。其他阶级只解放自己一个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要实现社会的普遍解放，因为它是这个社会最后的解体。把无产阶级解放了，就意味着其他所有社会阶级都解放了——即通过总体化的革命彻底打破旧世界。

但现在，用的是私人的办法：无产阶级只关心自己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怎么使自己获得解放。这样，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就发生了根本逆转——无产阶级本来的革命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现在则是“无套裤汉也要面包”。无产阶级只是自己特殊生存利益的实现者，只是想改变自己的经济待遇，而不代表整个社会发展变革的方向，就必然只能是孤家寡人。无产阶级沉醉于私人的办法，所以在1848年六月起义当中被整个法国社会视作暴民。无产阶级起义之后法国其他阶级都在惊呼：红色恐怖到来了。

托克维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讲，1848年6月起义就是“一帮暴民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搞乱整个国家”。

无产阶级水平不行。无产阶级原本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率先倒下。

倒下之后，无产阶级就不断依靠其他阶级的力量，但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B** 然后出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共和派、秩序党**。马克思借共和主义宪法的内在矛盾对法国资产阶级作了一个辛辣的讽刺，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无能**。也是幼稚的，幼稚体现在共和主义宪法的内在矛盾：它是一部**自杀的宪法**。马克思对共和主义宪法的批判是对自由主义宪政的根本批判，指出了宪政内在的困境和矛盾。

为什么？——体现为三个方面：

(1) **绝对权利与秩序**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我们之所以要有宪法、宪政，是因为要一个稳定的秩序。然而，资本主义宪法必须诉诸自由平等的绝对权利：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罢工自由，等等。这种权利是绝对的，因此，自由和秩序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矛盾。自由主义的办法是什么呢？每个个体的自由权利都会冲突，那如何达成均衡、秩序？——很简单，你的自由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当时法国的共和宪法也是如此规定的。马克思说，“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不受他人同等权利、公共安全、法律限制中是无限制的，而法律就是要使它们协调起来。”共和主义宪法说，绝对权利仅有在危害他人权利/影响公共安全两种情况下受到限制，其余则无限制。然而，“所以，后来两方面都……：一方面是要求限制所有自由的秩序党人，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个部分都包含自己的对立面。**在一般情况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当自由……对它的真正实现设置了障碍，不管现实存在中这种自由是怎么被消灭的，它在宪法上的存在总是完整无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结果导致秩序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宪法解释中的尖锐对立，共和主义宪法从而解体。

共和主义宪法的内在矛盾，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革命就是无法无天**。自由主义宪政所达到的这样一种理想状态，既要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又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就是密尔《论自由》的核心论证，也是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关键，但它是**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的法制只有在稳定的日常政治当中才有可能。现代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都具有这种形式主义的特征：表面上给你充分的自由，实际上却取消这种自由。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代议制**制度的出现。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是严格按照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产生领导人的？雅典民主走向了民粹，后来西方的现代民主则抛弃了直接民主的做法，走向间接民主——选出人民的**代议士**，代表人民行使权力。有了这个代议士，自由就变得不自由了，民主就变得不民主了。例如，严格按照1人1票算，希拉里就会代替特朗普当选。然而美国的选举人制度（赢家通吃）是以州为单位来决定的，经过选举人制度的中间环节，就不再是少数服从多数了。这就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政治秩序：表面上都有自由、都有权利，但这些自由权利在具体的程序中都被消解了。然而，这种消解之所以不会被反抗，是因为它处于一个常态的状态。而共和主义宪法在1848年之所以岌岌可危，是因为它是革命当中的宪法。革命不要谈宪政。革命就是无法无天。梁漱溟可爱的地方就是这样：五四运动，“学生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你们毕竟违法了。”然而，五四运动是革命，是运动而不是事件。革命就是非法的。这就是革命状态和日常状态的区分，这样的矛盾必然出现自杀，一派必然用权利主张革命、另一派必然用秩序镇压革命。

自由的绝对权利和秩序之间的张力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中是和谐的，但在革命状态却陷入分裂。这告诉我们，宪政只能在革命之后，而不能在革命之中。宪政是革命完成后，对革命成果的法律承认和巩固。宪政的建立，意味着告别革命状态，建立常态政治。

(2) **立法议会和总统的矛盾**。也是因为共和主义宪法采取的分权制度。**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开。在1848革命尖锐地表现为立法和行政权直接的对抗：波拿巴是如何作为行政权的代表，战胜立法权的。波拿巴最重要的敌人就是议会。马克思恰恰讲到，这种分权制有天然的**不平衡性**：(a) 第一个不平衡性，是**议会的抛头露面和总统隐居极乐**。“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七百五十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议会刷存在感，和我们中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大不一样。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立法权看似实现了？——马克思画风一转。它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另一方面总统则在极乐世界过着隐居的生活，看着人民批评750人的议会。

(b) 第二个不平衡性，是**议会的分裂和总统的集中**。立法权集中在750个人身上，而行政权集中在1个人。750个人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各种不同方面，但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

(c) **“民选的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和国民发生的却是个人联系。”**所谓形而上学联系，因为选择的是一个抽象的国民议会。所谓形而上学联系，就是你能和少数几个人大代表有日常联系就不错了；但是总统则不一样——“我只认准你”。我不想选你，你就是臭狗屎；我愿意选你，我就是你的粉丝。特朗普、韩国瑜这样的个人都“是光，是电，是唯一的神话”。总统的肉身在现代民主中非常重要。他意味着感性、活生生的个人力量，国家精神的化身，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机构。感性的联系，和粉丝追星是一样的道理。“总统是**神权**的体现者，是国民恩赐的赏赐者。”总统是票选出来的，每一张选票就意味着信仰和认可。总统赋予了感性的色彩，就像上帝的化身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世界上再严格采取三权分立的国家，比如像美国，现在已经发展出一种“超级总统制”。美国的山上会刻着美国最伟大的总统的头像，而不是最伟大的参议院、众议院院长头像——总统是美国人的神。通过一系列选举、造势，直接和选民发生联系、对话，完成了一种神权的体现。我非常喜欢的，今天左派一个非常天才的学者**阿甘本**有一本书：**《国王与荣耀》**。在这本书中，阿甘本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政治神学**。这就是从马克思这句话出来的。按照我们的想象，今天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进入私人领域，国家是和宗教无涉的、中立的公共性机构，但阿甘本却说，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政治神学并没有退场，宗教是被放逐到私人领域当中去，但神学却回到了政治的公共领域，出现了总统作为神权的体现者。政治神学，就在希特勒当选为德国元首的时候（希特勒也是通过民选上台的）罪淋漓尽致体现出来（《人民的意志》：希特勒如何获得民众的欢呼）——选举时候民众的每一次欢呼，就是加冕。再民主化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把总统个人的肉身重新圣化、重新神权化。马克思说，当时的波拿巴就是神权的体现者。神学仍然阴魂不散，在群众的每次集会欢呼、总统的每次造势活动中都能体现出来。

所以，立法议会和总统在这些方面都是不平衡的。立法议会只能撤走总统，但没法限制其权力。这是共和主义宪法的第二个矛盾。

(3) **宪政秩序和戒严的矛盾**。即法律和刺刀的矛盾。马克思说，制宪会议是在卡芬雅克对巴黎戒严之后才开起来的，才有共和宪法的诞生。巴黎戒严和宪法出台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其联系绝非偶然，而是有内在联系——宪法的权威是要靠枪杆子加以保证的。马克思说，这部宪法是在刺刀的保卫下完成的，刺刀是它的恩人，但同样的刺刀也会挑战宪法秩序。秩序党人之所以后来失败，就是丢掉了枪杆子——“一旦秩序党人丧失了军队，就宣告了自己统治使命的终结。”

所以马克思说：“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么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是指向人民的）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刺刀可以保卫，也可以瓦解这样的宪政秩序。

真正的宪政，是在暴力的垄断基础上完成的，而非在暴力的放弃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斯·韦伯：国家是垄断合法暴力的机构，使得个人的暴力成为非法垄断。靠什么手段？——宪法必须掌握军队和国家机器、强力机关和专政机关。没有这样的暴力垄断，宪政作为法律条款就永远只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朝不保夕。宪政要垄断所有的暴力，而不是对暴力的放弃。真正的宪政不放弃暴力，而只是隐藏了暴力。宪法在革命的时代是苍白无力的，守卫这种宪法是政治上的天真。

所以马克思对法国的资产阶级下了一个深刻的结论（马克思多次提到这一点）：宪法的手段无法解决实质性的社会矛盾。

六月起义之后，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成红色恐怖。这个时候，“社会主义”在当时的法国就被妖魔化、污名化了。（我们都可以理解这种心态）“你才是社会主义，你全家都是社会主义！”本来和社会主义没关系的东西，比如自由社会的立法权、公开言论辩论自由等等，只要威胁到社会秩序，都被斥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么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也被污蔑成了社会主义。一方面它的这种统治形式给了所有阶层以权利，但当他们用这种权利来反对它的秩序，就成了悖论。

马克思说：“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解释，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统治建立起议会制度，这个议会制度在内部需要辩论。然而，为了维护议会制度的存在，就禁止了其他人对议会制度本身正当与否的辩论。这就构成了资产阶级形式主义政治的二律背反。赋予所有人权利，但这种权利如果反对你的形式主义政治秩序，这时候怎么办呢？自由主义自身是否合理也需要经过公开辩论的检验，怎么能强制地把绝对权利、立法议会、宪政秩序当成一般信条？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政治统治是无法依靠自身的原则建立的。

所以马克思说：“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的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会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会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你们又怎能因为站在下面的人们跳舞而惊奇呢？”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的二律背反**。要垄断自由，才能建立资产阶级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表面上承认这些自由权利，却要取消它们。资产阶级本身最大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后面所讲的更加形象：“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结果是受到马刀的统治。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结果是它自己的报刊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结果是它自己的沙龙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结果是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结果是戒严实行起来对付它了。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法庭，结果是它自己的陪审法庭被军事委员会所代替。它把国民学校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结果是教士支配起它自己的学校来了。它不进行审判就流放囚犯，结果是它自己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任何运动，结果是国家权力镇压起它自己的社会的任何运动来了。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作家，结果是它的政治家和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出来混都是要还的。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二律背反。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二律背反，是因为，**资产阶级的专政建立，就像宪政一样，一定是在革命之后，而非革命之中**。之所以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会陷入到马克思所描述的以共和宪政为例的种种二律背反当中？——因为法国的资本主义不够纯粹，资产阶级不够发达，不是社会主流阶级。法国停留在小农生产方式中，也没有通过英国式的工业革命的彻底完成成为经济上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说：“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它有所表现的地方，它也不能采取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形式。”这就是法国的现实：**资产阶级的专政由于法国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所以没有建立起纯粹的政治表现**。英国建立起纯粹彻底的资本主义，所以才有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法国则因为资本主义没那么纯粹，所以仍然是为了反对一切国家政权而斗争——所以，马刀把资产阶级自己也赶下了台。

归根结底，共和宪政的失败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彻底实现。

马克思说，对法国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让无产阶级最快地占领法国，而是“革命本身首先要创造一种形式，使资产阶级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获得最彻底、最广泛、最普遍的表现。”（这句话在出版时删去）只有发展到这一步，才能被推翻、再也不能站立起来。因为，那时候，对国家政权的斗争就会转化为对资本统治的斗争。

**C 波拿巴派**。从马克思对于革命下降路线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之所以**波拿巴**脱颖而出，不是他太强大，而是他的队友太猪。无产阶级也不行，资产阶级也不行，所以波拿巴这个小人才可以逐一击破、分化瓦解各个阶级。《雾月十八日》的整个结构，就是讲波拿巴派怎么和不同派别联合又干掉了不同派别。法国的所有阶级都不能独当一面，因为法国在小农生产当中。

**2.** **小农阶级**。所以马克思分析**小农阶级**——波拿巴主义的真实基础。它们是小块土地所有制，在反封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地主阶级的存在使得农民和地主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农民没有掌握自己的生产资料，马克思称之为**泛农奴制**。拿破仑使得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获得自己的小块土地，i.e. 生产资料，“耕者有其田”。自给自足，但也自私自利。小农阶级存在两个问题：

**A** 它**自身无法代表自身**，一定要找一个代言人，即波拿巴。为何如此？这段段落是《雾月十八日》的核心段落：“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法国的小农确实是一个阶级，生产方式相同、利益相同。然而，它们不是一个阶级：“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铃薯之间彼此隔绝，没有有机的联系。所谓隔绝的状态，就是说：小农—家庭—村庄，都是高度**离散化**的。这种离散化是由他们的生产方式造成的，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这些人只要专注于自己的土地、私人利益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离散化的、隔绝的小农生产方式，政治上的致命缺陷是**没有发展处出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这点非常深刻。小农生产方式的要害，就在于四个字：**自给自足**。就意味着，可以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大部分生活资料（必需品），没有**商品交换**，也就没有**任何分工**，也就没有**社会联系**。这种相互隔绝的马铃薯状态，使得他们不能称之为一个阶级，因为**阶级必须建立在组织化的基础上**。资产阶级之所以是一个阶级，是因为有组织化的基础：市场。市场的基础上，就会有行会，有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阶级，是因为在机器化大工业高度紧张有机配合的分工中建立起了社会联系，有组织性纪律性，而小农阶级则分散。小农阶级由于他们的离散化而非组织化，虽然从生产方式、利益诉求来看是一个阶级，但又不能组织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所以必须找一个代言人。这就造成对官僚、威权的崇拜。所以皇帝制度和小农生产关系是有根本的联系的。

马克思这段分析，就解释了中国几千年来皇权专制的自给自足小农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中国社会的停滞，和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最早研究翻译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家**王亚南**，就通过马克思的分析看出了这一点。在自身无法代表自身的基础上，小农阶级选择了波拿巴。

**B** 第二个原因，是**小农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的变化**。拿破仑反封建、打地主，通过分土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小农阶级都是反对封建制度的同盟军。然而，一旦通过革命，小资产阶级变成资本家，农民就和他们变成了对立关系。因此，在这样的对立关系中，小农自然支持波拿巴来打压资产阶级。这就是波拿巴的名义基础。利益使小农阶级把票投给波拿巴，愿意为他的加冕而欢呼。

基于这两点原因，波拿巴获得了小农的支持。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行的时候，依靠小农阶级，波拿巴主义获得了国家的相对独立性。

通过这样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像国家的相对独立性这样的上层建筑**，马克思首先从**阶级格局—阶级力量的对比**来分析，而其背后其实是**法国的生产方式**。这个**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上层建筑）是依赖于无产阶级的幼稚、资产阶级的无能、小农阶级的庞大的，根本的原因是小农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经济基础）**。《雾月十八日》看似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上层建筑反作用的方式）**，但这种相对独立性要在小农主导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根本规定性）**中才得以解释。

政治国家的相对独立性，是说政治国家相对市民社会而存在，而不是说，政治国家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这样的经济基础而单独存在。它相对的，是市民社会，而不是经济基础。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仍然要到经济基础处得以合理解释：它仍然受制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此外，马克思的分析还说明了**小农生产方式的解体如何引发波拿巴主义的终结**。这一问题，我们下周继续讨论。

#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期4 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把握1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4 2019.10.9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上周我们讲到，为什么会出现国家的相对独立性？——两个原因：

1. **革命的下降路线**，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无法主导法国社会格局。

2. **小农阶级**，构成了“**行政权主导社会”的真实基础**。小农阶级最重要的特点是，它既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阶级。这是我们理解小农阶级的关键。之所以说它既是一个阶级，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利益诉求。然而，另一方面它又不是一个阶级——小农之间彼此隔绝、互不关心，没有形成公共关系。公共关系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小农阶级的彼此隔绝使得他们不能称为一个阶级？

这就要从阶级构成的条件讲起。构成阶级，不是光有阶级利益和共同诉求才行。这只是一个自在状态的阶级，而没有进发到自为状态。没有形成阶级意识，就不能称为阶级。哪怕他们有共同的利益诉求，都无法通过公共化、组织化、社会化的手段来表述自己的阶级诉求。因此，阶级形成的重要条件，必须要有组织化、公共化，由此形成一种集体意识。

为什么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不存在小农阶级这样的问题？——这两个阶级的产生都依托于发达的社会交往关系形成。资产阶级作为资产者，资产者的确在市民社会中是以原子化的自私自利的个人的形式存在的，但在原子化的个人背后，还有黑格尔所说的需要的体系和发达的商品交换关系。这种发达的商品交换关系就是资产阶级之为阶级的社会网络。他们有发达的联系。

无产阶级也是如此——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发达的社会联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这点，如果阅读《共产党宣言》，会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特别讲了大工厂生产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写于正义者同盟要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时代，正义者同盟当时以以魏特林（裁缝出身）为代表的手工业小生产者为主。马克思说，魏特林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是“出于本能”：我穷我有理，我要反抗。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不是每一个穷人都有资格称为无产者。穷人和无产者的区别在于：穷人在各种社会都存在，而无产者是现代大工业生产条件下的产物。马列主义强调无产阶级最有组织纪律性，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在大工业条件下，由于高度发达的分工、高度紧张的协作形成发达的社会联系。无产者是被大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流水线分工）组织整合起来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之为无产阶级的发达社会联系。

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大工业、反对魏特林这样出于本能的社会主义者？——魏特林这样停留在小作坊小裁缝的手工业生产者，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们往往在无产阶级革命时候会拒斥工业化发展成果。

什么意思呢？魏特林当时在德国（包括当时法国），工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机器化大工业生产让自己失业，所以他们的反抗形式是捣毁机器。捣毁机器意味着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必然发展趋势——这个从工场手工业到大工业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所以光是通过捣毁机器来反对、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可取的。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是说，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为无产阶级革命做贡献。无产阶级革命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之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要让无产阶级出场进行革命，因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得以调节。这是《资本论》着力证明的。马克思在这里，对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工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提出了批评，要求他们的意识上升到大工业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意识。之所以大工业对无产阶级如此重要，是因为它让无产阶级成为阶级，它创造了非常发达的社会联系。如果像魏特林那样，每个人停留在自己的作坊，那这和法国农民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是缺乏发达的社会联系。

小农阶级之所以不能称为一个独立自为有阶级意识的阶级，就是因为它的生产方式使其没有进入发达的社会联系。这样的小农生产方式决定了，小农阶级有一个天然的缺陷——他们无法自身代表自身，一定要通过别人代表自己。这是小农阶级的**政治表现**。那么，谁来代表他们呢？——靠官僚、靠波拿巴。这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比如《水浒传》：《雾月十八日》是“文革”中很多人奉为经典阅读的文献。包括后来对于“文革”的反思，比如我们所知道的，文革后期引发巨大思想启蒙的思想家（文革中已经死去）顾准：不管是在文革中造反，还是反思文革，都在阅读《雾月十八日》。因为在文革的过程中，毛泽东干了一件事情，就是评《水浒传》。毛泽东对《水浒传》的经典评论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农民是没法自己代表自己的，必须诉诸皇帝为自己代言。这就是小农的政治表现。文革以后反思文革，就是反思中国一直以来的小农生产方式，只不过把封建皇帝变成了毛泽东而已。《雾月十八日》文本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历史，是非常吊诡的现象。中国小农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会依赖皇帝、官僚、中央集权体系，来为自己代言。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民似乎仍然还有这样的想法，例证在于“中央是好的，地方官是坏的”。

小农阶级就成为了行政权主导社会的真实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不行而小农阶级独大，这根源于法国的生产方式。法国的生产方式还是停留在前资本主义的小农主导的生产方式。所以恩格斯后来有一个反思：马克思写完《共产党宣言》（1845-46）之后很快就发生了1848革命（-1852），这段革命中无产阶级显然是失败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的反思，得出的重要结论是：1848革命的失败表明当时欧洲的生产力还没有提升到足以爆发革命的程度——资本主义机器化大工业还没有完全展开，英国当时还是世界工厂。所以，不可能会出现一个典型的，《共产党宣言》所讲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分化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派，无产阶级造了资产阶级的反。

这个文本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是非常多的。我们都知道，马列主义给我们的一个印象是，它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动力，阶级社会的进步依靠阶级斗争。好像马克思就成为了“阶级斗争的代言人”。但是，我们会很清楚地在这个时期的文本，以及其之后的反思中看到——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书信中讲得很明确：“阶级斗争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把阶级斗争引入历史学领域，也不是马克思的创造。因为，当时法国的史学家就已经开始用阶级斗争眼光书写历史了。比如当时最著名的基佐。马克思认为，自己对阶级分析的最大贡献在于，领会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必须和当时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理解。阶级斗争不能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阶级斗争要在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中、在当时社会的特定的生产方式中加以把握。

政治表现依托于阶级格局，阶级格局由经济基础决定。

因此，我们读《雾月十八日》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圆圈。进入这个文本的时候我们想着“这个文本如何凸显了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国家反作用市民社会？），然这个能动作用最后又回到了经济基础之上。马克思说：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解体，波拿巴主义终将破产。用马克思自己的话，就是《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句话：“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汪东圆柱顶上被推下来。”随着生产方式的解体，上层建筑必将发生变革。

为什么？

1. 从根本原因上来讲，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必然要被农业的工业化、土地的集中等社会生产力内在的发展趋势所替代。改革开放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初期，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回归到小块土地所有制，把地分给了农民，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然而，现在你再回过头来看，还是不是包产到户？——不行，现在开始讨论农地流转问题，还是要搞集约化大工业，搞大农场，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生产力的发展进步。

2. 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马克思百般看不上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应该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人——你看雨果《政变记》、马克思《雾月十八日》、波拿巴《拿破仑观念》，他政治手段非常高明，但马克思为什么觉得他是跳梁小丑，拿破仑拙劣的模仿者？——关键原因是，拿破仑的成功并不等于波拿巴的成功。在小农生产基础上建立的庞大国家机器、国家相对独立性的外观，需要有一个经济基础——赋税。庞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当然主要也是小农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和军队越来越庞大，农民的税负也就越来越重。农民因为赋税问题就已经反对了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当时拿破仑的手段是通过外部扩张来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说，“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赋税。”也就是说，通过掠夺、战争、兼并、殖民，拿破仑转移了小农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所谓的“拿破仑观念”有四个支柱：小块土地所有制、政治上强有力的政府、意识形态的教士统治（天主教对法国国民精神的控制）、对战争的狂热。通过对外战争连本带利一并偿还小农的赋税，是拿破仑当年得到小农拥护的关键。

但波拿巴有这样的基础吗？马克思的预言非常精准。波拿巴也要不可避免地走向对外扩张，而最后也就是因为一场对外战争——普法战争的失败，导致波拿巴主义的迅速解体。普法战争的失败，就使得波拿巴下台了。如果战争失败，不仅转移不了矛盾，还多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小农的赋税更重，所以必然解体。

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看得非常清楚：波拿巴主义不可持久。小块土地小农生产方式的基础一旦解体，波拿巴主义行政权主导社会就会岌岌可危。

还要注意：当马克思写到，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解体必然导致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建筑物的倒塌，他同时也说：“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在第一版中马克思说得更加露骨：“打碎国家机器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

马克思文本中的巨大矛盾：**小农生产方式的解体**是会导致**军事官僚国家机器解体**，但军事官僚国家机器解体**并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马克思把这后半句话给删掉了，但手稿里很明确。为什么？——这种军事官僚国家，是和封建社会相对，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而中央集权制是在军事官僚国家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这很奇妙。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明白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和中央集权制不是一回事。所谓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就是波拿巴的这套体系，它的确是反封建，反对国家权力被领主、诸侯、骑士阶层瓜分，国王形同虚设。所以，封建社会的解体在欧洲历史上并没有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出现绝对主义（绝对王权）国家。在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有一段这样的插曲。绝对主义的国家强调行政权的主导、国家权力的统一·集中·完整。关于这点的拓展阅读：**佩里·安德森[[1]](#footnote-1)《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绝对主义国家就是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反对封建社会，但不是中央集权制。

为什么军事官僚国家解体之后并不会出现无政府状态？——我们从历史中已经看到这一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进入无政府状态，而只是权力互相制衡。而且，就算美国这样的三权分立，还是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强势总统制。为何如此？需要读**恩格斯《论权威》**。

恩格斯在《论权威》所讲的是：随着机器化大工业的发展，生产是越来越组织化的，所以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权力的垄断集中体系。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必然会出现官僚制、中央集权制，而且这种中央集权制会不断加固。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当年的发现。恩格斯更像一个组织者、将军而不是马克思那样的哲学家，他特别强调组织化纪律化。恩格斯发现，随着社会组织化，中央集权制只会继续加固。中央集权制也有其经济基础——机器化大工业。详细的论证参照《论权威》。

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官僚制、中央集权制的分析，最为深入的是德国的另一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中央集权制这种官僚制（用韦伯自己的概念：**科层制**）是现代社会无法消除的一个顽疾。我们经常批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但在韦伯看来，这种官僚主义是不可克服的，因为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合理化［理性化］的社会。这个“理”是工具理性，就是什么有效率就按什么原则组织起来。这种理性非常无聊（无趣），韦伯将它形象地称为“**理性的囚笼**”——我们都生活其中。我们并不关心意义之有无，而只关心有效还是无效，所有的理性都以此为原则计算。整个社会都显现出这样一种合理化的趋向，所以科层制不可避免地也是合理化的一种表现。因此，必须要“一级管一级”。这种科层制，在国家层面存在，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经济领域中，哪个国家把这种科层制发扬到了极致？——日本。日本的株式会社中，下级对于上级的服从是绝对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大半级压得半死不活。日本的这种株式会社科层体系发达到什么程度？——犯错都一起犯，从上错到下。（联系最近日本钢铁企业的问题）

这种官僚制·中央集权·科层制的经济基础，就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即韦伯所哀叹的理性化生产。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我们叫**组织化生产**。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所生活其中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恩格斯逝世以后列宁所概括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金融寡头的结合，引发一战·帝国主义·殖民地战争；在列宁以后，垄断资本主义并未解体，而是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在组织化资本主义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像恩格斯/韦伯所说，越来越具有组织化/合理化特征。所以后来**列斐伏尔**说，二战结束以后发展起来的组织化资本主义构成了**受官僚控制的消费社会**。国家权力对整个紧急生产的支配作用越来越强大，在社会中出现了福利国家，依托国家力量供给工人福利，形成了人们对国家的依赖、对官僚体系的默认。这种组织化资本主义在上世纪60年代末发生了巨大危机。在当时的法国，发生了**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的发生，就是和这两个原因有关。

1. 受官僚控制。五月风暴当时在法国发生，迅速波及整个西方社会，就是因为官僚主义实在是太过庞大了。当时五月风暴指向的就是戴高乐保姆型政府。这种政府的确带来安全、繁荣，但也带来了等级，更重要的是带来了韦伯所说的理性化和无聊。戴高乐，包括西方很多国家，为人们勾画了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图景，从而导致了无聊。

2. 消费社会。人们沉迷于消费和娱乐，生活没有意义，只有无穷无尽的娱乐。我们今天的中国也有点类似于这种情况。饭圈文化、综艺节目，只能带来感官的刺激，也是无聊。反抗无聊，就构成了法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对官僚制社会、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反抗。

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在五月风暴的时代，**萨特**会成为法国的潮流？——存在主义强调意义。为什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大行其道？——无处安放的力比多被官僚主义·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中压制。**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在五月风暴中写就，直指人们在娱乐产品中丧失了批判能力，从而形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带来解构的狂欢？——就是对这种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反抗和控诉。

此外，这种科层制还进入到日常生活，连我们的消费都受到了官僚制科层体制的控制。然而，这个和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社会——越发强调活力、反对福利国家、出现新自由主义——似乎不相符合？我们今天强调的不是等级化科层制，而是扁平化，这是为什么？——组织化资本主义也解体了。70年代之后，我们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弹性资本主义**。这种生产不再强调组织化、规模化，而是强调流动化、个性化、弹性化。70年代，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三次能源危机，使得西方摆脱了制造业依赖，而越来越多进入服务业、金融业。传统的制造业是非常组织化的（*ref.* 深圳富士康），甚至连工人的生活都要被规划起来。工人的所有娱乐、消费都是为生产更多产品服务的。这种组织化方式最大的困惑在于无聊，所以富士康工人多发不堪压力的自杀。然而，现代西方由于能源危机完成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强调计算机、信息技术，这就使得西方的产业结构从原来工业、制造业为主强调金融、服务业为主。金融强调快速流动，服务业强调个性化生产、私人定制。因此，到了西方国家，大规模生产的衬衫T恤没人买，意大利限量版手工皮鞋热销。消费社会摆脱了官僚制度获得解放，就进入了**鲍德里亚**所说的**符号体系**。

弹性化生产，使得整个社会从技术条件、文化表现、社会运行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从技术条件的角度来看，电脑成为后组织化时代的标志性工具，意味着整个组织运行的网络发生了深刻的调整。电脑和电视有着深刻的差别。本质性的差别在于，电视是单向性的，而电脑、网络是双向性的。过去传统的电视是“你播什么我看什么”，西游记/还珠格格一再重播，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没别的看。春晚也是如此。这种电视观看方式背后其实是一种组织化生产方式。电脑和电视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双向性的，是“我想看什么你生产什么”，发展到今天就是微信朋友圈、今日头条。你喜欢关注什么，就给你推送。它围绕着你转，不再是你围着它转。所以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我们不能指望春晚如何出彩。供给方式、社会运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组织化生产，你当然觉得春晚好看；今天你怎么被它吸引呢？过去人们专注电视的内容，今天电视沦为了墙上的背影。电视里放的东西无关紧要，大家都在刷手机。电视的价值和意义，似乎只是看电视的三个人还是一家人而已。电视的单向性，到互联网的双向性，就是组织化变成弹性的体现。不再强调刚性，而是强调弹性；不再强调集中，而是强调流动。

从这些例子来看，社会的制度都是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这就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小结：**

我们所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其真实含义是什么？或者说，阅读《雾月十八日》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何处？

1. 第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不简单等同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这两个命题经常会混淆，很多人觉得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我们会发现，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没有讲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是讲述了国家相对市民社会的独立性。但是，这个命题的颠倒，并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失效。国家相对市民社会获得相对独立性甚至压制市民社会，最后还是离不开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国家的独立性只是相对市民社会而言，并不是相对经济基础。国家并未超越当时法国社会的生产方式获得独立性。因此，国家的独立性是相对的独立性，它的独立性仅仅是相对市民社会，而非也相对经济基础而言。

2. 第二点：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1) 我们一再强调，不要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成两种泾渭分明的实体，然后找这两种实体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把经济基础看成是一种视野**：**要想理解上层建筑，就必须深入到对经济基础的分析之中**。例如，军事官僚国家的解体为何没有威胁中央集权制，表现为科层制—受官僚控制的消费社会，而生产方式的转变又怎么再使这一社会解体。

(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实体严格对应的关系。其实，**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这是我们社会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和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流派：**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一直到今天的哈贝马斯、霍耐特等）。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社会批判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批判：**文化工业批判**。所谓文化工业，就是无穷无尽地制造感官刺激泡沫的娱乐业。这种文化工业带来的，就是娱乐至死，就是无聊，就是有意义的批判的失落。今天的文化生产再也不是艺术家本着匠人精神的苦心营造，更多的是一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今天的明星是各种各样的娱乐公司炮制出来的，再也不是靠自己的才华成功的。文化工业的现象，就标志着，今天上层经济和经济基础的界限已经在瓦解。

所以，应该把经济基础理解成一种视野，透过之来看上层建筑的问题。

3. 第三个启示：不要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变成口诀、公式到处搬用。在不同的国家、社会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千差万别。所以，**应该从特定的事实和历史情境出发，就像马克思分析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样，分析各种经济条件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如何互动**。不要变成一种单纯的革命代数学，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当成函数关系精心推演；而应当做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序言中所写的，理解社会时事的一把钥匙。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有什么特点？

1. **总体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构成了一个统一体，没有脱离经济基础存在的上层建筑，也没有脱离上层建筑单独存在的经济基础。有时候经济基础决定作用凸显一些，有时候上层建筑反动作用凸显一些，但是不管如何它们构成有机的整体。

2. **交互性**——既不是经济基础只决定上层建筑，也不是上层建筑只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而是它们有双向的互动。

3. **条件性**——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如何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都是依托于一定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情境，那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就会变成抽象的革命代数学、抽象的教条，变成两种关系之间的机械决定。马克思哲学的任务，不是建立抽象的教条，而是把原理变成一种视野、线索，理解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让我们把书读薄，而是读厚，用生动的现实填充干瘪的理论。

4. 特别要注意，二者的**不平衡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确有总体性/内在一致性，就像《雾月十八日》所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函数的映射关系），而是两者有不平衡的特点。这种不平衡特别体现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错位**，尤其是上层建筑不能符合经济基础所产生的。这就是《雾月十八日》重点讲述的：其正文第一句话就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为什么拿破仑是悲剧，波拿巴是笑剧？——拿破仑之所以建立军事官僚国家、借助小农生产方式，是因为反对封建社会，顺应了那时候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它的悲剧性，就体现在，这个时候上层建筑所有一系列的改革都是为了顺应经济基础，是宣告一种新的、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的上层建筑的出生的婴儿的啼哭。它就算被扼杀在摇篮，也是悲壮的。然而，路易波拿巴是笑剧——他的上层建筑注定建立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在拿破仑的时代小农生产方式有进步性，在路易波拿巴的时代则是落后性，就变成了笑剧——拙劣的模仿。理解“悲剧和笑剧”，就要放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平衡性的视野中。是悲剧还是笑剧，关键就看上层建筑所反映的经济基础发展方向到底是革命性的［顺应上升趋势］还是反动性的［背离上升趋势］。

5. **动态性**。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在变化。它不是静止、凝固的，而始终处于一种剧烈的变革中。

1. 佩里·安德森在今天国际左翼学界非常重要。现在国际左翼的代表刊物《新左派评论》的主编就是佩里·安德森。他的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意识依靠文化符号的调动形成，因此所谓的共同体不是某一种实体，而是通过想象——即文化符号和对于文化符号的认同形成的。 [↑](#footnote-ref-1)